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05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1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专辑

02

人类制度尚未找到唯一答案，中美合作更加必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02
对话 中美竞争的核心不在经济体量，而在于创新创业活力与人民满意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林毅夫	05
大学的国家属性 林建华	10
扭转生育率骤降，要着力减轻对女性的“生育惩罚” 赵耀辉	16
小学与初中毕业仍占60%，“减负”带来的两极分化值得深思 雷晓燕	19
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城乡教育差距急需缩小 姚洋	23
对话 如何才能让人口和教育政策标本兼治？ 赵耀辉、雷晓燕、姚洋、王敏	26
【平台经济十二问】平台经济的创新价值、财富分化与监管难题 黄益平、李力行、席天扬、汪浩、沈艳	32
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及2022年就业形势 卢锋	44
对房产税改革的几点看法 赵波	48
宏观经济“三重压力”的诊断与应对 伍戈	52
对话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的难点与政策的新意 卢锋、赵波、伍戈、黄卓	54
中美两个大国要为全球担当而协作，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争端上 迈克尔·斯宾塞 ..	58
对话 如何理解数据监管、共同富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姚洋 ..	61
快速发展仍是中国未来30年关键中的关键 林毅夫	64
2022年企业经营关键词 陈春花	67
科技创新企业的榕树模式 薄连明	71
传统平台的数字化转型决心和方法一样都不能少 汪林朋	74

学院资讯

76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05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5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我们选择将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精彩演讲完整展现，因此本期在栏目上不再区别“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本届论坛一方面高度聚焦当下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热点议题，另一方面加强了与中国学者与世界的对话。开幕环节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主题演讲，林毅夫教授与之对话；闭幕环节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教授主题演讲，姚洋教授与之对话。

在议题方面，上午的重点是人口与教育，分别有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北大国发院姚洋教授、赵耀辉教授、雷晓燕教授、王敏副教授（长聘）等一同参与。下午的重点是平台经济与宏观经济。关于平台经济，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年，国发院不仅有“平台经济十二讲”为公众启蒙，黄益平教授、

沈艳教授、汪浩教授、李力行教授、席天扬副教授（长聘）等又在本届论坛上研讨和答疑；关于宏观经济，如何在全球变局中认知和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下行，卢锋教授、赵波副教授（长聘）、黄卓副教授（长聘），以及来自长江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展开了深入研讨。林毅夫教授还在闭幕论坛上发表了重要演讲。

在下午的管理分论坛上，陈春花教授发布了2022年的经营关键词，国发院实践教授薄连明、校友汪林朋分享了对科技企业发展和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解。

所有这些深刻而真诚的思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北大国发院践行着持续以学术与现实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初衷。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人类制度尚未找到唯一答案，中美合作更加必要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²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很高兴就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些相关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目前，困扰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中美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国际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全球合作是必须的，却又是艰难的

我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当今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但这条路并非坦途。

比如说，目前最重要的全球问题可能就是气候变化，它关系到我们整个世界的存续；再比如说新冠疫情问题，还有更广泛层面的国际法治问题。为了经济稳定、和平与繁荣，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每个国家内部，法治都是非常必要的，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十分重要，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以上都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或“国际

公共产品”。这个术语是我在大约25年前提出的，现在已成为一个标准的专用名词。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全球科学领域的合作，我们一起确认了造成这种可怕疾病的病原体，研发了疫苗、抗病毒药物。这些快速行动是全球科学家携手合作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知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价值。

不过，这个合作进行得并不彻底，因为对抗疫情并不只是科学层面的事情。比如疫苗接种，人类拥有了疫苗，并不等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了疫苗，并且用得起疫苗。问题是，病毒一直在变异，只要病毒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有向着更危险的方向变异的机会，对整个人类都是威胁。

令人痛心的是，很多经济体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都是自我利益至上，人类远未达成我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合作，很多国家之间还恶化了彼此间的关系，这种失败非常令人忧心。

我们能够在病毒检测、疫苗研发等更复杂的

1. 本文根据斯蒂格利茨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视频演讲翻译整理。

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当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经合组织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评估衡量部门高级专家团联合主席、美国智库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2011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斯蒂格利茨以其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

领域展开合作，为什么却在很多本该简单的领域却不行呢？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和社会体制的合作方面反而比科学还困难呢？

目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世贸组织的新冠疫苗专利豁免。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世贸组织为此问题原定于本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因为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的流行而被迫取消了。假设疫苗专利豁免的提议在一年多前的十月份，即首次被提出的时候就获得了通过，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可能会好得多，也许变异毒株根本就不会出现。

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全球合作也非常必要。在大多数国家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并恢复增长之前，强有力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既可以从乐观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悲观的角度看。

从乐观的角度看，在发行特别提款权方面，合作正在开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了价值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但是在另一些领域，合作现状仍比较令人悲观，特别提款权如何回收和再分配，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完备的框架。

另一个令我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债务处理。许多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负债累累，疫情将它们进一步逼到了绝境。我们需要跨境债务重组机制，尤其是对于主权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建立跨境债务重组机制是我们的主要政策提议之一。2014年，该提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认可，接着在201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的支持率通过了一套准则来指导这种重组。然而很不幸，一些债权国拒绝表示赞同。从那之后，此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如果这个机制存在，本可以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产生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可能需要多个这样的重组。过去，债务重组进行得太少，或者进行得太晚，而且，几乎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重组在完成之后会在五年内

经历再次重组。在这种“太少、太晚”的框架下，债权方和债务方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过去，债权方之间的博弈使这些债务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而今天的债务问题也无法使我们乐观。我们连在疫情期间暂缓还债这一点上都无法达成充分的全球合作，这让我感到很悲观，因为这意味着实现债务重组所需的那种全球合作将更加难以实现。在这一领域，中国和美国必须进行合作，以保证所有政府机构、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都完全参与进来。

美国已经不再是 40 年前的美国

现在我谈谈中美经济关系更宽泛的问题。

与特朗普执政期间相比，如今两国经贸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不同。直白地说，特朗普不懂经济，他从零和世界的视角来看待一切问题，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得好，那么另一个国家就会发展得差。这当然跟我们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知识相悖。如果规划得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特朗普不理解多边贸易赤字的本质。其实，赤字是国内宏观经济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讽刺的是，赤字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变得更糟了。这不奇怪，因为他为亿万富翁和公司减税的政策拉大了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刺激了多边贸易赤字的上涨。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还存在其他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绝大多数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我在此不再赘述。但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我在《全球化逆潮》这本书中谈到，美国并没有充分解决其过去40年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分配后果，这导致其贸易自由化议程失去了政治支持。

在过去40年里，美国所推行的贸易议程是



由特殊利益驱动的。现在，美国必须面对后果了。

举个例子，世贸组织框最初是在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款协议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条款实施的方式对知识的获取造成了阻碍作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削弱了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使我们无法保证使最不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充足的疫苗供给。现在，美国必须面对贸易议程缺少支持的后果，贸易已经成为美国国内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制度没有唯一答案，中美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个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在世贸组织初创的时候，随着国际经济议程的制定，人们曾一度产生了对未来的过分乐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中他认为，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终将会融合趋同。

现在大家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短期内不会。这反过来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有国际规则的基础。当时的规则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而这一套理论现在已被广泛质疑。

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大家普遍对产业政策避而不谈，认为一个国家无论是生产薯条

还是生产电脑芯片都无关紧要；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没有太多市场了，人们接纳了产业政策。但这就要求我们对公平贸易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一个普遍共识是，国家援助会造成竞争环境的不公平，而产业政策可以被视为国家援助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最终，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割充其量会变得模糊，国内和国际都是如此。

毫不奇怪并且值得赞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对民主和人权问题都极其热衷。引用一句莎士比亚的话“To err is human(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都难免犯错误。在西方，至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不仅一直在为提高知识水平而努力，还在为改善我们的制度、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而奋斗，并且一直把包容、民主和人权放在核心位置。这是我上一本书的中心主题，书名是《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我们经常壮志难酬，但这激励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不懈努力。关于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无论是短期策略还是长期结构和战略，都存在很多争论，不同的观点必然会对国际经济规则造成不同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要忽视一点，也就是我发言开始时所说的：为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对话 | 中美竞争的核心不在经济体量，而在于创新 创业活力与人民满意度³

徐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林毅夫⁴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非常荣幸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本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对话。对我而言，斯蒂格利茨教授既是导师，又是朋友，更是我的榜样。在中国，我们常说，作为一名精英应有志于用自己所学去造福社会。根据我的观察，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践行这一理念。过去，作为一名学生和朋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今天，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智慧启迪。

我想问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提到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很大不同，主要原因之一是特朗普不懂经济学，而拜登政府很了解经济学。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在拜登上台后出现很大的改变，特朗普执政时期所提出的关税等政策仍然维持不变。所以我想问的是：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关系方面产生了哪些不同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非常好。正如你所说，拜登执政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但并

没有取消对华关税以及其他贸易限制政策。这可能如我刚才所讲，中美摩擦背后还有其他一些驱动因素。比如美国国内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尤其是在产业领域，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美国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继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问题。由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变得难上加难。本世纪初，当我们向中国打开市场的时候，美国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美国国内担心，如果现在降低关税，又会导致相似的情况出现。

我想说的重点是，拜登政府明白，世界不是零和的，对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双方都能获益，并且他们也承认，美国的贸易赤字并非由不公平贸易引起的，而是国内总储蓄与国内总投资之间不平衡的结果。所以，拜登政府的经济哲学确实与特朗普时期不同。

那为什么拜登政府仍然延续特朗普时期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呢？原因就在于，现在支撑这些政策的逻辑不再是对经济学的误读，而是拜登政府对经济和政治方面问题的考虑。所以事实就是，

3. 本文根据两位教授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特邀对话”环节的对话翻译整理。

4.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



尽管原因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

林毅夫：感谢您的解答。作为知识精英，应当用知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对于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而言，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以及生活福祉。目前，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大约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使这一比例上升到至少 50%。到那时，因为人口更多，中国经济体量将会成为美国的两倍。这中间就会经历中美作为第一第二大国的换位问题。

近期有很多讨论，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换位、矛盾，似乎经常导致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使用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来想办法避免追赶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因地位变化而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个人认为，只要两国之间没有军事对抗，国家的经济体量大小并不那么重要。使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应该是公民个人的能力、创新创业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等。

举例来说，美国有很多家企业，如果说企业规模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每个行业应该只有一家企业才对。但美国有非常强势而完备的竞争政策，目的就是确保每个行业都有多家企业可以自由参与竞争。我们相信，许多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才是有利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同样道理，欧洲是继续让很多国家并存，还是进行更深度的国家间融合，并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欧洲是否保持了竞争，是否促进了创新创业的活力，是否提升了人民的利益。

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中美经济竞争领域，同样的道理是：核心问题不在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谁大谁小，而是谁更有创新创业的活力，谁能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对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的，是值得竞争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或者行业内应该有一家主导企业，我对此持

否定态度。欧洲、美国、中国，都应该有强有力的政策来保护竞争。我不太认同那种认为一国经济体量决定一切的观点。

林毅夫：关于这个观点，我想我还没有被您说服。我们都是经济学者，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两国进行贸易时，一定是较小经济体获益更多，较大经济体获益更少。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达到美国的两倍，那么美国将会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更多。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不幸的是，经济政策并不是由您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来制定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如此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知识精英不仅应当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也应当贡献给人类和世界。最近大家经常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题，在这种大变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全球治理方面的变化。比如，在 20 世纪初，1900 年左右，有一个八国联军，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他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加起来占全球 GDP 总量的 50.4%。到了 2000 年，出现了八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替代了解体的奥匈帝国。八国集团的 GDP 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 GDP 总量的 47%。这意味着，在那一百年当中，这 8 个国家主导了全球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中也非常努力地发展经济，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发展中国家的 GDP 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仅仅提高了 3.4%。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以至于人均 GDP 方面与八个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收效甚微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想起了 1991 年在匈牙利参加一个学术论坛时有幸聆听过您的讲座，是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您讲的内容让我非常难忘，您的主要意思是，转型国家不应该按照

我们（美国）所说的那样去做，而应该按照我们（美国）实际做的那样去做。发展中国家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原因，是否就在于他们是按照美国教给他们的办法（说的）去进行转型，却没有按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际施行的方式（做的）去进行发展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也想起了40年前的那次演讲。那时美国实际所做的是非常重视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在推进科研与教育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对外，美国说自己没有那样做。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美国告诉其他转型国家说：你们应当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不要让政府插手任何事；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生物医学研究，DNA的发现等等重要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有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指出发达国家自己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实现了快速发展，然后就踢开了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上去的“梯子”，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所谓的（有限政府）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林毅夫：所以说，中国在过去40年能发展得那么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给我们推荐的理念和方式去做。

您在经济学领域的成果使我深受启发，您在全球政策制定领域的积极参与也鼓舞了我。比如，您是联合国数个委员会的主席，向联合国、WTO、WHO等国际机构提出了非常多的政策建议。您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您的不少政策建议都得到了这些机构的采纳。例如，2014年您建议给深陷债务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面对疫情，您建议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如果这些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实施，我们所处的世界肯定比现状更好。

为什么您的一些建议，一些有坚实论证支撑

并一定会造福人类的建议，最终却没有获得实施甚至采纳？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世界做出有益的贡献，但好建议却常常得不到采纳，更得不到实施，我们该如何改善这方面的全球治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什么那些明显正确的政策建议没有获得采纳？以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这件事为例。这是我在2020年10月提出的，如果当时这项建议能得到采纳和实施，全球新冠疫情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人类在抗疫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讽刺的是，WTO原定于2021年12月初在日内瓦举行讨论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会议，却因为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的流行而被迫取消了。也就是说，他们当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行动，结果影响到他们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WTO当初没有采纳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这个提议？其实答案很简单——制药企业反对。制药企业为什么反对？因为他们要从疫苗垄断中获利。销售疫苗给制药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收益，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疫苗价格会下降，制药企业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但是，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全球抗疫形势会大幅好转，病毒也本不会产生如此多如奥密克戎这样的变异毒株。所以，这是一个“人民”与“利益”相对抗的例子。

不幸的是，现有国际组织架构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极大影响和制约，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制药企业；在金融领域，是华尔街；在债务问题上，是债权机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议题与普通民众距离较远，在民众之上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国家政府，更不用说全球治理机构了。因此，让老百姓从全球治理的大局角度去看问题是很难的。然而，虽然大众不去关注，但这些议题，如知识产权、债务重组机制等等，实际上在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一生除了撰写学术文章和专业书籍之外，



还特意写了一些适合大众的科普书、畅销书，还经常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我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唤起大众对这些全球议题的关注和参与。制药企业、金融机构、华尔街等，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全球议题，为什么要和国际组织在相关议题上进行斗争，但老百姓不明白。我们作为经济学者，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给大家，呼吁大众站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利益集团的人只占人类总数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重视的是全人类更大的人群。在新冠疫情下，我们看到了利益的失衡，制药公司攫取了极其庞大的利益，却是以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为代价。因此，人类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去重建平衡。

为了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问题，我做了很多努力，我联合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以及许多前国家领导人，共同试图说服拜登和其他重要国家的现任领导人一起支持疫苗专利豁免。我们已经成功说服了拜登，接下来我们需要说服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这很不容易，但我希望我们能成功。

在债务重组问题上，只有少数国家支持我们，这将是未来几年要打的“一场仗”。

林毅夫：我觉得您应该经常来中国，因为您刚刚提到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好的采纳和实行，包括债务重组和疫苗专利豁免等，中国正在进行实践。您在中国有很多“粉丝”，去年您的新书出版时，我和您做了一次线上对话，当时的听众超过了300万人。

您在刚才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全球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在格拉斯哥 COP26 气候峰会上，中美签署了联合宣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释放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让我们看到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接下来，中美应该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进一步的合作，去避免或缓解我们之间的冲突或摩擦？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于解决诸如疫情、非法移民等全球挑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仍存在着一些

对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合作扩大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明确地提出目前最重要的全球合作就是使全球公共品发挥最大的作用，包括在气候、环境、海洋、医疗等领域的合作。我还提到了全球学者间知识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合作使得我们能够联手控制疫情的肆虐。

亟需全球合作的领域还有为贫穷国家进行债务重组以帮助它们提升生活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落实也需要全球合作，以确保资金被有效用于帮助最贫穷的国家。

我认为，最首要的是大家需要理解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合作中受益。

这个世界最基础的合作一定是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包括学者之间与教育机构之间，而不是政府之间。我注意到，一谈起合作，大家都过多地把关注点放在政府间的合作上，但其实，组成国家的是人民，人民之间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基础。

举一个人与人合作的例子，最近我与尼古拉斯·斯特恩等欧洲一些顶级学者在研讨绿色转型的问题，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能源转型、系统转型等。讨论非常富有成效，我们彼此启发良多。此时此刻，我和林教授以及在场中国学者通过 Zoom 会议系统的对话也是这样一种合作，可以帮助我们交流思想，深化相互理解，达成合作。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可以互助互补。

林毅夫：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美国正面临通胀的问题，如果美联储采取退出货币量化宽松（Taper）的政策，对于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提升利率是否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目前的通胀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方面都有体现。然而，提升利率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能源问题和粮食问题，反而会使情况恶化。通过提升利率来抑制通胀，结果会让

经济受损。

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帮助大众适应通胀。实际上，短时期内的通胀问题还是比较好管理的。因为最受通胀影响的人群大部分是老年人，但他们都可以得到社保的保护；工人的工资随着危机时升时降，他们也是相对受保护的。通胀问题最

难解决的是与政治问题的关联，因为大众很在意物价的上涨。如果不考虑政治，只从经济角度看，我认为提升利率不是解决通胀的好办法，反而会减缓经济复苏的速度。好在目前美国应对通胀的措施非常谨慎，所以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复苏应该不会出现严重的放缓。



大学的国家属性⁵

林建华⁶

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

前面林毅夫教授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中提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人才和教育。在国家的发展中，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把教育做得更好？如何才能让教育更有能力支撑国家的发展？这其中涉及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在此与大家一起探讨。

如今大家都说，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确，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大学发生了巨大的、令人赞叹的变化。作为变化的亲历者，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一切相对容易，进入深水区以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简单回顾近些年出台的一些教改措施，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改革不那么成功。有时候，我们已经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但常常是“事与愿违”，解决了一个问题，却诱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教改进入深水区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为什么有些改革很成功，有些不太成功？

第一，从政策环境看，目前国家对教育和学术都是非常重视的，投入也非常大，很多大学创办一流大学的决心也非常坚定。但另一方面，我

们的学术氛围并不理想，学校、学者和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并没有充分激发出来。

第二，从大学发展看，很多学校尚处在资源驱动的发展阶段，校园建设、基础条件、办学规模等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塑造学校内涵文化、树立办学理念、建设合理机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方面，仍有许多欠缺之处。

第三，从学术研究看，我们中国大学发表的SCI文章全球最多，但原创相对较少，关键技术还掌握在别人手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国外。如何调动学生的内在创造潜力，而非仅仅传授专业知识？这方面仍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四，从人才培养看，2021年10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如何使改进学术文化，营造好的学术氛围，使中国成为优秀人才向往和聚集的学术殿堂，这方面仍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说，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四唯”现象很严重。实际上，文章、职称、学历、奖励作为学术评价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把这些指标与地位、待遇甚至学术资源挂钩，学校就被赋予了很强的功利色彩，科学精神和学术氛围因此也受到了玷污。

5. 本文根据林建华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演讲整理。

6. 林建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重庆大学校长。

另外，进入深水区，面对的都是复杂问题，解决起来是比较难的。例如，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多阅读、多讨论、多与老师交流，我们曾经尝试把大学阶段的必修学分从 180 分降到 130 分。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学生们有了时间，并没有去深入研究或读书，而是去读第二学位。他们仍然在不同的课堂间奔波，没有深入思考，或者去针对某一课题展开更深的研究。面对学生长期形成的应试习惯，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这是教育改革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否则只能是：愿望很丰满，结果很骨感。

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和教育的国际合作正面临挑战。官方和校际的国际合作关系陷入停滞，民间学术交流也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正面临一项新的、紧迫的任务，即建立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建立起自主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能赢得尊重，才能更好地合作。最近，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提出要重视人才的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的独到竞争优势。

客观地讲，经济快速发展、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以及大量的人才储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但在教育理念、学生应试习惯、独立的科学精神、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等方面，我们仍存在短板或面临挑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改进。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当然要包括一流的学术基础研究条件，这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环境和氛围，使我们的学生和学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和做学问。只有当学者和学生们在国内比在国外发展得更好，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世界各国的学术和人才体系都有自己的特色。

美国吸引人才的实力很强，各国人才聚集到美国，他们的顶级学者中有近一半来自国外。日本自主的学术和人才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的顶尖学术人才主要都是自己培养的。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术和人才体系的自主性也很强。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人才流失严重。与此同时，借助国际教育与学术合作，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学术人才。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建立我国的自主人才体系，让我们的大学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有一些基本属性，国家属性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大学还有更为基本的属性，包括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等。大学想要发展，教育和学术想要发展，这些属性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大学的国家属性

首先来看大学的国家属性。在很多人看来，大学是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这足以说明今天的大学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一属性在逐渐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和趋势。

与蔡元培时代相比，大学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巨变。因此当我们谈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时，必须清楚今天的知识活动已具有非常强的利益属性。知识在创造财富，也在产生权力。当教育和学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时，国家自然会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比如，现在的学术研究资助主要来自国家，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很多私立大学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科研资助来自联邦政府。

由此可见，大学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大学在刚刚出现时，并不具有国家属性。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是一所由学生创办的大学，常被称为学生大学。巴黎



大学也是成立较早的大学之一，它由教师自发组织而成，也称作教师大学。当时，建立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学生的安全和利益。

不难看出，大学的出现是教师和学生的自发行为，因而自治也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大学一直游走于教会和王室之间。那时候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并不具有国家属性。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个人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大学从何时开始具备了国家属性？答案是 19 世纪初拿破仑时期和德国的洪堡改革。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全额资助大学，并给大学确定了国家任务和目标，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这就是大学国家属性的开始。

此后，知识经济和地缘政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国家属性，地缘政治竞争是导致大学国家属性增强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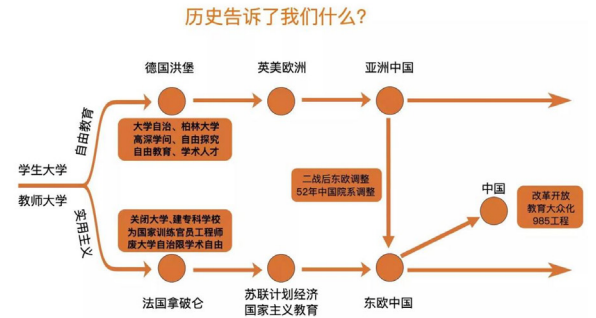
教育的国家属性不断增强，将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从政府的角度看，既然承担了高等教育几乎全部的责任，它就获得了管理大学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纵观过去两百年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和大众化进程，可以说，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普及与繁荣，都与政府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推动，就没有高等教育今天的局面。

当然，政府的主要责任并不是教育，而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卫国家安全。而且，政府看问题的角度，与学校和教育家是不一样的，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常常会带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和功利特征，这也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大学独立和自治的原因。

上述情况早已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反复得到印证。欧洲大学出现之后，一直保持了独立性，但同时变得保守，甚至腐朽没落。启蒙运动和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拿破仑和洪堡的教育变革。虽同样是在政府推动下的变革，但欧洲大学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拿破仑的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势教育变革。他关闭了大学，解散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建立高等专科学校。拿破仑明确提出，大学要为国家训练官员和工程师，即大学教育要为国家服务。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提出把服务国家作为大学的任务和目标。与此同时，把大学纳入政府官僚体系，废除了大学的自治，限制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拿破仑的教育变革在短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支撑了对欧战争和法国的霸权。

我曾经访问过巴黎高科，与校长会谈之后，他邀请了两名在该校就读的北大毕业生与我见面。这两名学生都是在数学系学习，但见到他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两人都穿着军装和军靴。他们向我解释，巴黎高科是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学校，自成立之日就按军事化管理，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每天要上操，也要军训。这是一所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校，在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才培养上独树一帜，但它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同样是政府主导的教育变革，但德国的洪堡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当时的德国是战败国，迫切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国家。洪堡赞赏法国的学术发展，认为教育可以助力国家振兴，但他不赞成拿破仑的模式。洪堡看得更长远一些，他坚信，大学是师生共同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

真正释放教师和学生的潜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精英人才。洪堡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推动大学变革，而是另辟蹊径，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也就是柏林大学，以榜样引导德国大学的变革。

柏林大学成立后，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不仅吸引了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前来任教，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此后几年，德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柏林大学的管理模式。洪堡模式也成为日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学效仿的模板。直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大学基本是按照洪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洪堡模式还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日本的大学以及中国早期的大学基本上也是按这种模式进行管理。

几十年之后，德国成为了世界的学术中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末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战后，法国对教育进行反思，又重新恢复了综合性大学。今天法国的教育仍然是一种混合模式，既有大学，也有高等专科学校。最近，法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大学调整。

拿破仑的实用主义教育模式，可以尽快满足国家急需，这对政府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上世纪20年代，为培养国家工业化的急需人才，苏联几乎按拿破仑模式对大学进行了一场大的调整，成立了各类专科学校。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东欧和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也进行了类似的院系调整。应当承认，这种教育模式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有贡献的，但其后遗症至今都难以完全清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再一次的转型或转变。

教育的个人属性

再来看教育的个人属性。教育面对的是一个鲜活的人，因而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个人属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

首先，教育是一种投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风险投资。这种投资耗费巨大，不仅需要金钱，更需要精神和时间的投入，学生们要将四年宝贵时间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去。如果学校没能把学生教好，或者学生在四年学习结束后没什么收获，这无疑是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教育是个复杂的心智成熟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种观点认为，教育就像往人类的潜意识里注入思想概念，就像是把一封信投入信箱，虽然知道该何时投递，但根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封信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收到并打开。这很好理解，老师教给学生很多知识，但并不确定学生是否学会，是否真正领悟。考试成绩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但不能说明学生是否真的理解，是否融会贯通，是否真正会实际应用。教育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其个人属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要“解放学生的心智”，释放学生的内在潜力。现在一些老师认为，讲完课，考完试，教育就完成了。其实，这只是教育的很小一部分。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理解力。最重要的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能否创造性地思维和行动。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行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要立德树人，学生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而是要靠严谨的学风、良好的校风，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把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性伦理、品行品格培养好，这是教育可以也应该做好的。

立国必须先立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国家繁荣的基础。换句话说，教育的个人属性是实现教育国家属性的前提。个体培养不好，国家目标也难以实现。马克思曾有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为此意。



学术的人类属性

最后来看学术的人类属性。学术除了具有国家属性之外，还具有人类属性。学术研究源于人们对未知探求的欲望。从本质看，学术是一种批判、质疑和创造过程，它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密切合作。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丰富这一宝库。

一般而言，政府和学术共同体在发展学术研究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学术研究结果是客观的，可衡量的。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人们都会认为是真实的。这与教育的主观性有很大不同。而且，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共性和可能的应用前景，更容易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学术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然而，政府常常会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学术共同体则更关注探求的过程。

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为延缓中国发展，美国不惜在教育与学术上与中国脱钩。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自己的学术发展并没有好处，是一种出于政治考虑而采取的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由于学术研究本身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也是为了呼唤对学术本质属性的认识，打破美国政府不得人心的做法。

学术研究的人类属性还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学术应当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这要求在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无论公司、政府还是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失去了对真善美的判断力和追求，科学技术也许会误入歧途。今天，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赋予了人们改变人类自身和人类文明的能力，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逆的力量。我们强调学术的人类属性，就是希望善用这种力量。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中，谷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作恶”。这看似并不“高大上”，但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

类属性”和原则。

推动大学变革的力量

大学的使命是保护、传承和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学者主导的共同体，这使大学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非常强大。例如，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旧大学，是很腐朽和保守的，抗拒着一切社会变革力量。发生在16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大学基本上没有参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是在大学之外开展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陈腐和保守的旧大学，已经成为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和洪堡必须进行大学变革的原因。

大学的变革主要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政府，比如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洪堡、苏联的大学变革，以及中国的“985工程”等等，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大学之间竞争，或者说市场竞争或社会压力引导的变革。德国洪堡的教育改革，有政府支持和推动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通过柏林大学的示范，引发大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出大学的内在活力。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因而美国大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

实现大学的变革，需要外部力量。但实现真正的大学变革，最根本的是内在觉醒。因而，只有那些能够萌发内在觉醒的外部力量，才是有效的、进步的，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否则，只会伤害国家长远利益，伤害大学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政府对大学的主导权，认识到政府可以是推动大学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政府的措施可能带有功利性，而这种功利性常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

一、大学已经有了很强的国家属性，并且这个属性会继续加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二、教育的个人属性和学术的人类属性仍然是大学的基本属性。

三、要想办好教育，必须要平衡好教育的国家属性和个人属性。

四、要想发展好学术，必须要平衡好学术的

国家属性和人类属性，守住人性的真善美。

大学的国家属性、教育的个人属性、学术的人类属性，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既看上去是相互矛盾冲突的，也是可以共生和共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平衡好这些因素，把中国的大学办好。



扭转生育率骤降，要着力减轻对女性的“生育惩罚”⁷

赵耀辉⁸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中国的出生人数自 2016 年以来出现断崖式下降，2019 年为 1200 万，2021 年可能会掉到 1000 万以内。这还是在最近几年一系列密集的人口政策出台的情况下。虽然“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来以后，新生儿人口曾一度回升，但并没有扭转整体下跌趋势。现在出台的“三孩”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能否阻止这种下跌呢？大家都在密切关注。

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人数现在已达到高峰，未来会持续快速下跌。中国周边东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没有限制人口生育甚至拥有鼓励政策，情况也不乐观。新加坡也很低，韩国更低。中国“七普”的出生率已经降到 1.3%，与日本 2020 年的水平差不多。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东亚人口将来会慢慢萎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上述对比表明：且不说是否放开生育，即使全部放开、没有任何限制，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有可能继续跌下去。但中华民族在其他地方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生育决策机制

我们该怎么理解现在的局面和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背后的驱动机制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

生育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决策，是个人优化的结果，取决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

我们进行分析时，要从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看。

生孩子的收益是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传宗接代自不用说，但是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养老，也就是在父母到了老年、没有办法去挣钱或者需要照料时，孩子可以提供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

同时，孩子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纽带，人类有天生喜爱孩子的冲动。

生孩子的成本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孕育过程中有一些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痛苦，也面临一些风险；其次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家庭会发生包括住房、教育等费用；再次是女性在生育和养育的过程中，可能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如果生孩子的收益越高，人们往往越愿意生；如果生孩子的成本越高，人们往往越不愿意生。生育率的下降和收益下降、成本上升都有关系。

降低生育的宏观因素

从降低生育率的宏观因素来看，首先是收益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转为

7. 本文根据赵耀辉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

8. 赵耀辉：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1995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 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期专注劳动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曾于 2006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 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耀辉教授还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

社会化养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养护老人的功能；二是婚姻的需求在下降，很多人到了30多岁还不结婚；三是孩子的“效用”也在降低，有各种各样的替代解决方案。

其次是成本方面，包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还有女性的机会成本，我们分别来看：

教育成本

中国大多数地方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了很多钱，还要花很多时间，但仍有很多焦虑。这也成为最近政策的着力点。

这种焦虑感导致很多亲子冲突，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毕竟孩子原本是给父母带来效用的，是让你幸福的，结果育儿的过程带来很多痛苦。这是收益的降低。

从长期影响来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快乐，精神健康可能受损。现在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孩子成年后难以发展亲密关系，恐婚/恐育现象难免增多。

住房成本

孩子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空间密集型消费品，至少需要卧室，如果房价太高，父母就没有办法提供更大的空间。

国际上房价较低的地方，生育率往往较高。中国人口特别密集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太高，所以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

女性机会成本

最重要的还是女性的机会成本，是所有成本项目里最大的一项，也是各个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最主要落脚点。

对比世界上各国不同时期的就业率，从1970年代到2000年，很多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上涨，现在是60%-70%，更

高者有70%-80%。女性的工资跟男性相比也一直在缩小差距，这是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趋势。目前美国女性的工资大概是男性的80%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鼓舞。从分年龄段的上大学人口比例看，年轻女性已经高于男性，这个转折点大概对应着1982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女性的就业率在改革开放以后略有下降，目前男性的就业率是94.2%，女性80.5%，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算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生育年龄女性的就业率仍相当高。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需求很高，就业率达到80%-90%。

在很多国家，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很少，而且对女性就业有很多支持，男女工资差别还在缩小，只是趋势已经放缓。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惩罚已经成为阻碍女性继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什么叫生育惩罚？简单说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以后获得的工资下跌，她也很难回到劳动力市场。

以丹麦为例，拥有孩子之后，男性的收入没有变化，但女性生完孩子以后的收入会下降，而且男女工资在20年以后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无法回升到之前的水平。用中国的相应数据来测算，女性收入在生完孩子以后也有非常大的下降，不过没有持续那么长时间，大概四、五年以后还能够涨回去。

生育惩罚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产假。在丹麦这样的福利国家，产假很长，虽然能够保护女性的就业岗位，但时间太长反而有害，因为这会导致女性长时间处于职场之外，增加返场的难度。同时还有各种生育相关福利，对于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来说，其实也有负面作用，而且往往很大。研究发现，产假延长等待遇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比较小，因为女性更在意事业前景。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政策领域是托育服务，在所有研究文献中，这都被证明可有效提高生育率。因为托育服务可以帮助女性留在就业市场，继续



发展自己的事业，降低生育成本。对于低收入的家庭而言，社会托育等服务价值会更大，因为她们更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请不起保姆，所以社会托育等服务更加重要。

前景展望

对于未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非常悲观呢？我认为不一定。虽然孩子的“使用价值”在降低，但是人类毕竟喜欢孩子，这是不会泯灭的天性。在老年照料方面，虽然有各种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孩子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这就给了我们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

在鼓励生育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增加和完善女性及生育友好型的政策。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减轻女性的生育

负担展开。当然我也不是说教育“双减”没有用处，另外产假有双刃剑效果，应该花更大的精力把托育服务做起来、做好，而且政府不要全都管，因为能力有限，要鼓励民办机构参与。

在教育方面，应该好好地解决教育资源供给问题，让大家都能够上高中、上大学。

房价方面有很多讨论，我不再赘述。

最后我提一点，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前面讲到东亚整体的生育率非常低，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东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比全世界仍偏低。男性往往不干家务，女性既要养孩子又要有事业，过于辛苦，因此就会“罢工”（不生育）。中国要提高生育率，一定要倡导男性承担家务责任，这样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多福。

小学与初中毕业仍占 60%， “减负” 带来的 两极分化值得深思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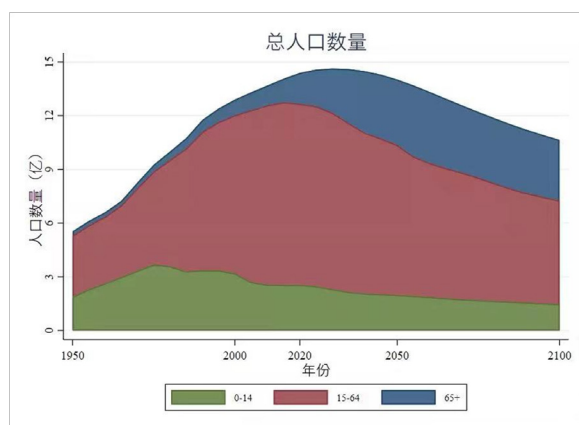
雷晓燕¹⁰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围绕人口与教育这一主题，我将从人口结构变化、教育现状与趋势、教育减负过往政策及其效果、当前双减政策及其效果展望等方面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思考。

人口总量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加速变老

首先看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下图是 2019 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关于国内总人口和分年龄人口变化趋势，人口总量在未来十年之内会出现下降，这已经成为多种预测的共识。



数据来源：2019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劳动年龄人口从 2020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降，少儿人口数量和比例也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从赵耀辉老师刚才的报告还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几年出现“生育率断崖式下跌”，这让未来少儿人口数量的变化不容乐观。同时，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将呈快速上升趋势。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乐观。具体来讲，劳动年龄人口中 45 岁 -64 岁的比例在扩大，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本身呈现高龄化。同时，老年人口中 80 岁以上比例也呈现扩大趋势，即高龄老人比例持续上升。

教育现状：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依然偏低

基于历年人口普查数据，1990 年 -2020 年这 30 年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持续上升，从 6.2 年延长到 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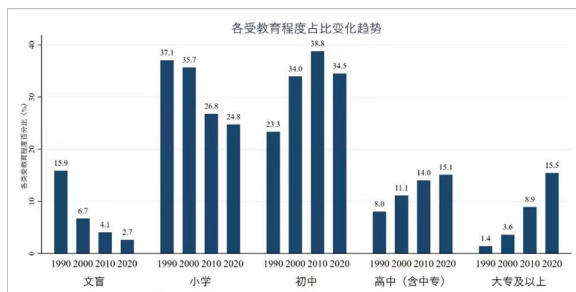
9. 本文根据雷晓燕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

10. 雷晓燕：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党委副书记，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人口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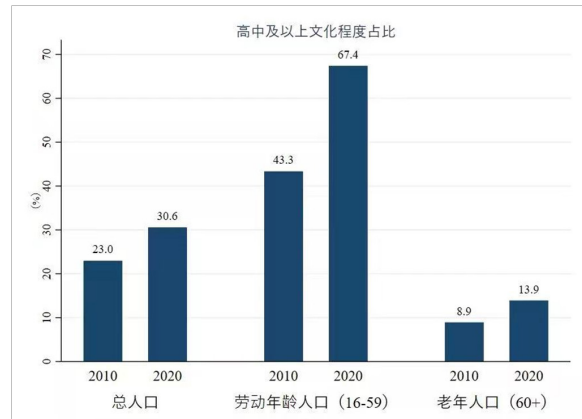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比例都显著提高，比如高中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提高到了 30.6%，但这同时也表明目前教育水平处于高中以下的群体还是占多数。同样的，文盲和小学学历占比都大大降低，但是目前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还是较高，接近 60%。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人口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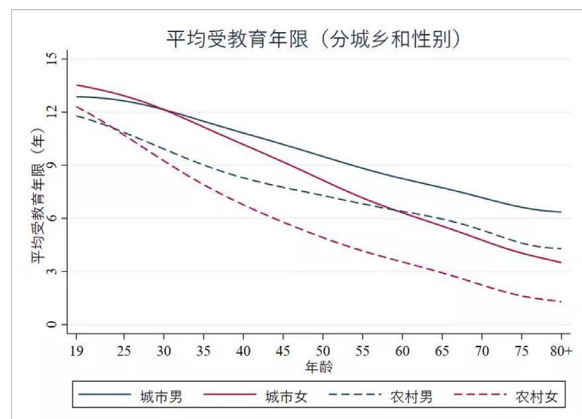
注：文盲率比例定义在 15 岁及以上的年龄群体，其他比例都是定义在全人群中。

分年龄看人口的受教育状况，16 岁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已从 2010 年的 43.3% 上升到 67.4%，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目前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超过三成尚未达到高中教育水平。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会答记者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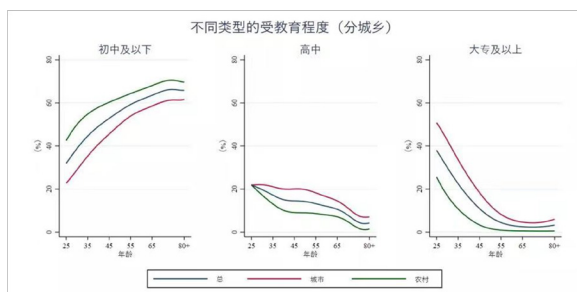
分城乡来看，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8 年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显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们的受教育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而且在年轻群体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赶超甚至反超男性。不过城乡差异一直存在，比如城市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年限都高于农村，城市女性反超男性的时间点也更早一些。



数据来源：CFPS2018

同时，城市和农村都是初中以下学历人口占比不断降低、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在不断上

升，但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均低于城市，除了年轻群体的高中学历人口农村和城市比例接近。农村 25 岁左右的年轻人当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仍然超过 4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低于 25%。可见，虽然发展趋势非常好，但是目前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升依然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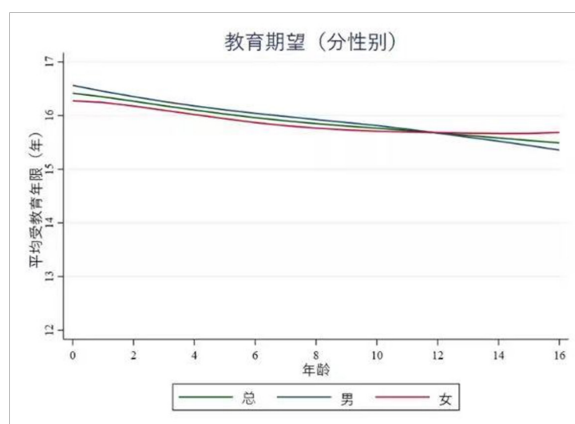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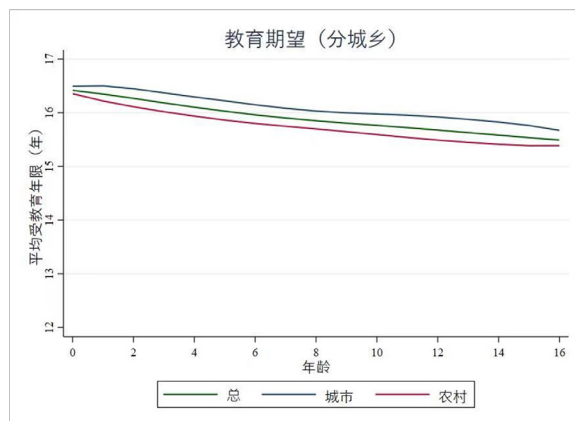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CFPS2018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我国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现在这批年轻人作为未来十年劳动市场的主力，其教育程度还不尽如人意。

未来劳动力存在强劲的教育需求

未来 20 年及以后的年轻人，受教育情况会怎样？由于这批人尚未完成教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期望来寻找答案。

依然基于 2018 年 CFPS 的调查数据来看，目前 0 到 16 岁孩子的父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基本上都希望孩子读到大学，年龄越小的孩子，父母期望越高，或者说随着年龄增长，期望会有所降低。分性别来看，12 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对儿子的期望比对女儿的期望更高，12 岁以后的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低于对女儿的期望。



“减负”带来两极分化效果不及预期，增加供给需保质量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水平还需要很大提升，同时个体当前确实也存在很强的教育需求，但是要提高教育水平不可避免的就涉及教育负担问题。过去十几年，为了减轻教育负担，我国采取了各种减负政策。我们团队梳理了 2005 至 2018 年间的教育减负相关政策，可以看出其中操作性较强的措施主要还是减少在校供给，比如控制在校时长、禁止校内补课等。我们进一步梳理各地的减负政策和措施发现，在升学压力较大（211 高校录取率较低）的地方减负政策强度更大。



六大维度	具体政策
入学与分班	禁止竞赛成绩影响入学 禁止组织招生考试选拔 禁止设置重点班(或要求随机分班) 限制班级规模
日常教学	严格依照课标行课 一科一辅或其他针对教辅的限制 控制在校时长
课后作业	控制作业时长 限制重复或惩罚性作业
课外补习	禁止有借校内补课 禁止任何校内补课 禁止教师参与有偿补课 限制校外培训机构
学生考核	控制考试次数 考试不排名、不公布分数或实行等级评价
睡眠与运动	控制最少睡眠 控制最少运动

来源：雷晓燕、沈艳、周子焜（2021）

2018年前的减负政策不断升级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的研究有以下发现：

从家庭教育开支角度来看，减负政策实施后，富裕家庭的教育支出更高，贫穷家庭的教育开支更低，实际上存在“越减越负”和教育资源更不均衡的现象。

学生的负担到底有没有减轻呢？研究结果显示，减负后学生的学习时间，尤其是富裕家庭孩子的学习时间增加，主要在于休息日学习时间更长。同样可见，以减少校内供给为主的减负政策并没有减少学生和家庭负担，同时还存在教育不均衡状况恶化的可能。

最近的教育减负政策一开始主要减少了校外教育供给，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有所调整，开始增加校内供给。不过我们今年暑期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和家庭的教育负担至少到2021年7月依然存在，同时学前教育供给不足、义务教育阶段校内供给质量差异较大，校内托管服务在时间、质量及监管等方面都还存在不足。

综合上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和思考：

1. 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非常需要持续提高教育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从人口的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

2. 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教育水平的提升空间比较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3. 个体和家庭存在强烈的教育需求，国家政策应从满足这一需求方面着力。

4. 目前来看，2018年以前的“减负”政策在效果方面不尽如意。

5. 最新的“减负”政策先减少了校外培训，也就减少了教育供给，后来增加校内供给的思路很好，但必须重视增加供给的质量，具体效果怎样尚待观察。

6. 校外教育亟需在合规前提下转化成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提升总的教育供给，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教育需求，同时也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城乡教育差距急需缩小¹¹

姚洋¹²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教育公平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富裕离不开教育，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跟共同富裕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不太理解。教育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关系在于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只要不是靠着石油等自然资源富裕起来的现代经济体，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发挥，都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和技术都以现代化的教育为前提。因此，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或观察：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企业家中的“草莽英雄”很常见，小学还没毕业，照样可以把企业做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级别的规模。然而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这种情况越发少见。不要说成为卓越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想要迈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成功的概率也正变得越来越小，可能已经远远低于5%。

教育是决定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我们曾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核算过，对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其教育回报率最高可达12%，意味着20多岁时

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经历，步入职场后的工资水平最高可能提高12%。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回报率仅有6%。当然，这也反映出年轻人受到的教育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

在我看来，本届的论坛上，把人口和教育这两个话题合在一起讨论很有意义。在未来，教育可能是我们对冲老龄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因为老龄化意味着没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可用，支出却要增加，必须提高人口的平均劳动产出。因此，我们要想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教育水平是根本，是关键。

林建华校长讲到教育的三重属性，其中一个基本属性就是教育的个人属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个人的教育，更应该注重提高每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要着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水平，令这部分人群有能力获得可持续的、更高的收入，而不能指望通过“劫富济贫”“削峰填谷”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那只会把我们带回共同贫穷。

教育的城乡差距急需缩小

既然富裕的关键是教育，共同富裕的关键当然就离不开教育公平。

11. 本文根据姚洋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演讲内容整理。

12.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2016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就我们目前的教育情况，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尽管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仍然没有缩小，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我们根据 CFPS 的相关数据，得出关于教育流动性的一组研究结果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上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教育与其父辈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约为 0.6，应该说相关性非常高。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这一相关性已经降到 0.35 以下，应该说相关性已经非常低，甚至低于当时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教育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人，其教育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重新上升至 0.5 以上。这样的一个 U 型大回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这些数据说明教育的城乡差距没有缩小，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流动性在下降。比如，在现在北大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率已经非常低。我每次上大课时都要做个小调查，满足上述条件的学生占比大概在 1%-2% 左右。当然，这限于我教学的班级，可能有标本的偏差。然而在我上学的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双减”可能治标不治本。雷晓燕老师的研究成果也说明，“双减”落地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家长开始聘请私教。然而低收入群体家长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差距反而在无形中被拉大，我们的政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入手，从中小学开始入手。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客观事实暂时无法改变，但各地都在积极地落实一些有益举措。比如江西省在降低考试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考题的数量，这样的考试其实是在考验人的智商，与知识掌握程度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减压。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可能要等到我们大学入学率达到 80% 的时候才能解

决，而我们现在的入学率还不到 60%。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政策建议

对此该做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做两件事情。

第一，普及高中教育。

赵耀辉老师在演讲中也提到这一点。现在很多省份都普及了 12 年义务教育，比如浙江，其他一些省份其实也有这样的财力。对于那些财政上存在困难的省份，是否可以考虑把初中和高中合二为一，从 6 年学制缩减到 5 年，再把小学压缩到 5 年学制，形成一贯制 10 年义务教育。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十年一贯制，总体来看，这样的安排也没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成才。如果觉得十年的时间不够，也可以考虑上大学之前增加一年预科阶段的学习，以最大程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根据 CFPS 的数据，在我国 1985 年出生的人口中，将近 10% 没能完成小学教育，这部分人大都生活在农村。

在教育拨款方面，我认为应该完全按照学生人数平均拨款，每所学校都该一样，不应该分类。现在有很多超级中学和超级小学都获得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学校的排类高。

第二，大学收费要改革。

能考上北大清华的这些学生，进入好大学已经相当于被奖励了一次。入学后，他们在学费方面再一次得到奖励。自 1997 年以来，北大的学费一直没怎么涨，大概是每年 5000 元的水平。然而一些“三本”“四本”学校，学费几乎涨到天上去了。我曾经见过学费八万一年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要承受高昂的学费及生活费，无疑是双倍的不公。

我认为，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好学校，可以适

当提高学费，国家拨款也可以相应减少。国家拨款应该向实力弱一些的学校更多地倾斜。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也可以拿出学费中的一部分设立奖学金，支持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通过这些措施在大学教育的层面把城乡差距稍微拉平一些。

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为何遇到这些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参与了一些讨论，也和教育界人士进行了交流碰撞，结果让我很吃惊。我发现很多教育界人士的精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层层选拔。像我这种

想要拉平城乡教育差距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天方夜谭。在这些人眼中，每个孩子的志向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付出的努力不同，因此选拔是必需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中小学教育不再以选拔为主，而是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主？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更关注林建华校长所讲的个人属性，更在意人的全面成长，我认为这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最有利的。



对话 | 如何才能让人口和教育政策标本兼治? ¹³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赵耀辉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雷晓燕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敏¹⁴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如何帮助女性应对生育与职场的两难

王敏：作为主持人，我先向每位嘉宾提一个问题。赵耀辉老师特别从女性视角强调了生育率的问题，大家也看到了中国未来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甚至民族发展非常不利。在此过程中，女性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受到很多歧视，主要是因为女性要生育、抚育，会挤占工作时间。

如果要促进生育，就难免会导致女性生育和养育的时间加长，在就业市场就容易受到歧视。到底该如何在政策层面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怎么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来纠正就业市场对女性就业形势的扭曲？

赵耀辉：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特别关键的问题。

首先是女性普遍有很强的就业意愿，有事业的追求。对于父母来说，多数人肯定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不要成为一个全职主妇，同时又希望她有孩子。中华民族的希望也寄托在女性要生孩子上。

这两个事情之间这么大的矛盾怎样去解决，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但核心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帮助女性既能够就业，又能够养孩子，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其实不是太友好的，可以看到女性生完孩子以后，在小孩 0-3 岁之间，必须某一方的父母来帮忙，但很多父母其实并没有时间来帮忙。生活在城市的父母，如果是 50 岁可以退休，那还好办一些；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则可能 60 岁、70 岁还在辛辛苦苦挣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忙。这样的话，必须要提供社会生育 / 养育方面的支持

13. 本文根据四位教授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人口与教育”专题环节的圆桌对话整理。

14. 王敏：北大国发院副教授（长聘）、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中国中心主任。2010 年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政策。以前，0-3岁之前还有单位的托儿所来管，后来企业改革就全都取消了。现在0-3岁之前基本上是空白，如果想在北平找一个育儿机构托管，起码一个月得上万，成本非常高，而服务质量等方面又不让人放心。所以，要想去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一定要提供托育照料的各种支持。

如何让“减负”政策行之有效

王敏：“双减”也是当前家庭非常大的压力，现在的教育非常内卷，都非常重视成绩，甚至对孩子拔苗助长。像有的学校初中生已经开始学微积分了，我个人非常不希望让孩子以违反教育规律的方式进入好大学，但这就是现实。从根本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孩子的“出口”问题，所有这些内卷都是为了进入好大学，接受好的高等教育。但问题是，中国的高质量教育是长期不平衡的，改革开放40年了，最好的大学还是北大清华，没有成长出更多的北大清华。也就是说，给定了这样一个供给的局面，另外一方面随着收入增长，更多人进城，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需求在增长，供给不增加，面对这个局面，目前“双减”政策又是以堵为主，我个人不是特别乐观。

想请问雷老师，在你看来政策层面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的长效机制，来解决中国高质量教育的供需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雷晓燕：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围绕着减负政策还做了理论模型，最后用数据去验证，确实发现在有选拔机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单纯地减少供给这种方式，最后的结果是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拉大了差距。

教育里真正的最终不平衡或者说供给不足，还是体现在高考这个阶段。目前读大学的回报还是高的，上好大学的回报更高。所以大家当然要去追求这个目标，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会继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优质大学教育供给不足，这个压力和负担就永远在，就永远无

法减少中学、小学负担。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所有中学都是同样水平，拉平了一切差距，但由于最终还是要通过选拔才能进入少量的优质大学，所以学生还是要去竞争，负担还是会大。

解决之道还是要落到提高优质大学的供给上。那怎样才能实现呢？供给要提高，这是最根本的。但是优质大学的供给要提高，这就需要有资源和人才。

在资源方面，一方面当然是国家提供资金，但这方面资源还是有限的，即使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所以怎样进行资源分配就变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是如何发动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想办法让社会和个人资源能够投入进来，这样共同的作用才能把资源的问题解决。

在人才方面，大学优质教育需要有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选拔机制。当前面临疫情冲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国外的人才愿意回流。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吸引更多优质的优质人才回到大学里，包括到北大、清华之外的其他大学里。

总之，如果资金和人才两方面都能够保证，再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进行配合，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优质大学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

王敏：接下来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姚老师。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是以公立教育为主，但是公立教育的资源配置是基于身份的，农村户口只能接受农村教育，城市户口才能接受城市里的教育。这就天然地会带来城乡教育巨大的不平等。基于这样的资源配置设定，如何才能缩小城乡的教育不公平？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口除了生育率不断下降，年出生人口从20年前的2000万掉到现在的1000万，同样有一个城乡差距问题。如果解



决城乡不平等的办法是增加对农村的教育，这在未来会不会成为浪费？因为农村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同时还有城市化率提高，人口不断进城，怎么既协调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又避免未来的浪费？

姚洋：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城乡差距的。中国是以公立教育为主，要缩小城乡差距，当然还是得国家想一些办法。

第一，我觉得应该取消按照学校的归类拨款的机制，这本身就不公平。为什么农村的学校归为四类，拿到的生均费用就低？按理说应该拿到的更高一些才对。

第二，应该加大对到农村教书老师的工资奖励，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能够安心在农村教学。有些省份做得不错，比如说北大对口扶贫的云南省弥渡县。我们去看了一些学校，学校里很多老师非常安心，就是因为云南省对老师的工资是 100% 保证，而且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很好的榜样。

关于现在的投入将来会不会造成浪费，我觉得中国已经过了（要开办更多学校）那个阶段，现在再到农村开设新学校肯定会造成浪费。农村学校数量在过去 20 年大幅下降，基本上十几、二十里范围就一所中心小学，孩子们三年级以上都住校，所以目前并不存在校舍浪费问题。目前人员的问题也一样不用担心，人员可以流动，如果这里不需要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总的来说，当前还不存在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浪费问题。

听众提问：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高校、985 高校与三本四本高校的拨款机制确实问题比较大。现在所谓的鼓励双向流动，其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优秀师资的流出更大，流入很少，造成贫富地区的教学资源更不均衡，这应该怎么解决？

姚洋：我们去对口扶贫地区云南弥渡县调研，发现这里尽管是贫困县，但教育内卷也非常激烈。我们跟县委书记交流，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压力

来源不是扶贫，而是教育。因为弥渡周边的大理州出现了几个规模较大的民办中学，高收费，给教师付的工资很高，这样就开始出现“掐尖”现象，这些学校把周边各个县的好学生都“掐”走了，本县的教师资源也流失严重。

这种“超级”学校的出现，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是致命的。好学生都走了之后，中等学生就变差了，因为剩下的学校不太可能有学生考上 985 的高校，要想考上，就得去超级中学，但家里没钱，也就没有希望。

这位书记最想提给我们的任务是能不能从北京引一个好中学过去。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么做，等于在这个县里又造成一个新的不平衡。事实上，绝大多数孩子还是只能上一般的学校。

我们恐怕要在思路上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小学最好去除选拔机制，实施平均化教育。这个目标并不是不可实现，日本就做到了。美国基本上也是这样，除了极少数的私立中学，美国不少州都把公立的、选拔性的高中全面取消。

我认为，高中之前的均等化教育应该成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能否对教育进行系统研究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在提问之前，我先说一点对于教育和人口问题的感想。

三位老师在人口与教育环节的讨论有一点悲观。无论从人口到劳动力，再到教育，挑战都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更悲观的似乎是，政策的作用比较有限。无论是姚洋还是雷晓燕讲的教育及相关的“减负”问题，还是赵耀辉讲的女性职场歧视等问题，政策的效果都不理想，尽管政府的初心是好的。

我就在想，国发院是智库，经常做一些政策研究，有没有可能劳动经济学这个研究组去做一

个系统性的评估，给政策制定做一些系统性的建议，而不是零零散散的研究。虽然关于“减负”的影响、怎么提高生育率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但作为第三方，对政策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提出一套完整的政策建议，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确实需要系统思考。

我感觉官员们其实一直在想这些问题，也希望解决，但出来的很多政策，要不就是没有达到效果，要不就是好心办坏事。类似的事情很多，所以需要有一些第三方的独立思考和更科学的建议。

对于教育和学校问题。其实中国台湾也曾开办很多大学，但后来就生源不足，大学产能过剩。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 1990 年代以来办了一批数量庞大的民办高校，但客观来说质量参差不齐。最近有很多金融科技学院，还有无人机专业等，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高大上，但确实是市场导向，学生很好就业。

如何定位和发展民办大学

黄益平：我想提的问题是给姚洋老师，现在对于民办大学的政策好像又要有变化。请问在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民办大学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姚洋：这些民办大学在过去 20 多年的确实对公立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但因为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很少，所以收费不得不弄得很高。现在高收费的学校基本上这一类，还有就是三本。

我在想，如果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恐怕还是要调整高校的学费系统。学费最终应该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然后通过奖学金制度来奖励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这样才能把关系捋顺。去上那些三本、四本的学生大多来自困人家，为了让孩子们去读大学，必须交很高的学费，其实是对这些家庭的双倍打击：不够好的教育 + 高昂的价格。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自己有亲身经历，一个亲戚的孩子就因为学费原因不想上大学。那是十多年前，一年的学费就要 2 万多，这孩子就想去广东打工，后来我让他回来读了大学。虽然只是大专，但也非常管用，他如今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但实实在在地说，这个群体并不是很小，很多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学费太高而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黄益平老师建议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挺好。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大报告，也许明年这个报告就值得写教育改革。

如何能让教育政策兼顾各方利益

听众提问：三位老师分享的很多数据都让我意外。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今天所谈的话题里似乎都跟我有关。首先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21 年 9 月份以前我是某教培机构的教师，10 月以后我来到某公立校。

关于 2005 年 -2019 年间的教育减负相关政策，我看了逐条细则，核对了一下学校落实教育规定的情况发现，我们落实了“不再把成绩进行公布和排名”，可家长不愿意；我们落实了“不留作业”，而且每天严格限制作业的时间，可家长不愿意，点名请老师给大家布置个性化的作业；我们也开放了所有的课后服务，以前老师是下午 3 点 20 下班，现在是 6 点下班。我发现，所有的规定落实之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刚需跟执行是拧着的，是一种抵触的状态。因为我是老师，同时也为人母亲，当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为孩子从正规渠道以及正规机构去获得一个合适的课外服务时，只能变着名目或者花费更多的钱。老师也一样，以前负责的是课内，现在还要负责早管理、午管理以及课后指导。

我的问题：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才能让政策更接地气，给我们这些教育的亲历者、



实践者减少苦恼和困境？如何进行更好的顶层设计？

雷晓燕：谢谢你的问题，你所描绘的情况恰恰反映出此前（2018年以前）的减负政策为什么会在执行中遇到压力，以及为什么导致两极分化。从根本上还是因为大家对孩子的教育有需求，但供给不足。

你提到的这些减负政策，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校教育的供给减少了，没有满足现实的需求；二是有一些政策也很难实行。比如留不留作业和排不排名，你不排名实际上学生也会互相问，只要有个成绩出来，也会知道排名。有些细节的规定根本没办法实现，这样的政策治标不知本。

刚才我提到国家最近的一些方案，是从补供给的思路出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要注意供给的质量问题。你也提到，政策提出了增加供给，比如规定老师要有几个小时盯在课后，但很多老师只是看管一下孩子，并不是家长真正需要的供给，没有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比如我们调研时发现，很多家长觉得“学校提供的托管服务只是让孩子在学校混时间”，我们还是要从源头去思考真实的需求满足问题。

赵耀辉：刚才黄益平老师提出来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政策研究。政策研究是最难的事情，之前的很多政策也可能都有学者的参与。但一项政策出来后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最考验学者的。一个学者是不是真正的好学者，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就在于他能不能预见到政策出来以后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能不能真正引导大家往政策预期的方向走。

在经济政策上，政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并不少。西方也有不少政府以为给民众发送一些福利，尤其是发钱一定是好事，但其实不一定，结果反而使他不想再努力工作了。

好的政策制定不仅需要有很坚实的学术支撑，要能够理解人的行为，还要能理解人们最深层次

的需求，这些方面都要做到。出台一项政策时，千万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大家都会按照你这种方式去走，要能预见到各种后果。

如何看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听众提问：我想请教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姚洋教授最近经常谈到中考分流问题。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20条”也对此有了定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今年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说国家已经强制执行一种政策，即中考之后学生五五分流，一部分上中专，一部分继续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有些地区甚至只有30%的学生能进入普通高中，70%要走职业教育。

请问老师们对于职业教育现在的发展、国家执行政策以及人才教育公平方面的看法。

姚洋：对职业教育，我本人还没有相关研究。我们马上要做有关中考分流的研究，会去保定考察。总体而言，我觉得14岁就让孩子分流的做法不好，特别有些地方还三七分流，更不应该。

现在的大学入学率已经接近60%，却先让70%的孩子连读高中的机会都没有，这不合理。很多人都说德国从10岁就开始分流，我们应该学德国。其实德国的制度在其国内并不受欢迎，也有很激烈的争论。但德国为什么还能坚持分流？有两个原因：

第一，德国保守势力太强大，他们坚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觉得10岁的孩子就能看出来；

第二，德国的职业教育是真正的职业教育。我去德国看过，那些学生两天在工厂里学习，其余三天还在普通高中里读书，依然在接受高中教育。而且做了工人以后将近一半的人还能再考上大学。如果我们真要让孩子们早一点分流，要学德国，那就学到底。

中国今天的分流是让孩子们早一天做工人，以后还能读大学的比例极低，而且绝大多数人做了工人以后不想再考大学，因为他们全要靠业务时间学习，太难了。这是对人才的浪费。在我看来，14岁就让孩子分流不可取。

有人说，中国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要加大职业教育。其实我们现在对这种简单劳动工人的需求并不大，很快会被AI替代掉。未来的工人至少要能开数控机床，要有大学毕业证才能做到。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考的分流都是不对的。

雷晓燕：大家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大学还是职业学校？一定是由学生的“出口”来决定的。“出口”又是怎么样决定的呢？就是由教育所能带来的回报决定。

什么样的教育能带来更好的回报呢？这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求有关。如果说我们发展到一个阶段，社会、企业需要某些方面的技术、技能、职业，需要这样的人才，那可以去发展这些相关的职业学校。企业愿意招这样的人，毕业生才有“出口”。有了获得更高回报的可能性，那么大家会自然地选择这样的职业教育。

我的意见是，如果要发展职业教育，还是从根本上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如果是针对社会需

求去办的职业教育，自然就会有人来选择，而不是强行规定哪些人就只能走某一条路。我们尽量不要过早去给孩子计划他们今后的人生，而是创造条件让他自己来做选择。

赵耀辉：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提供的技能不一样，提供的人力资本不同类。

普通高中提供的是一般性教育，职业高中提供的是特殊教育，培养特殊的人力资本。所谓特殊人力资本，就是你会知道怎么操作挖掘机、怎么理发，而普通教育是让你学习数学、写文章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一般性的、普适的知识，而职高提供的是有特殊用途的知识。

短期来看，可能职业高中的回报率更高，毕业后马上可以就业，普通高中显得有点浪费时间。但长远来看，尤其是在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行业起伏变换），通用型的技能综合回报会更高，因为更容易转行，更容易适应新形势。

家长们都明白哪一种教育对自己的孩子综合回报更高。我同意雷晓燕的观点，无论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多提供高质量的供给，让孩子们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硬性地设定一些比例，甚至强行约束。



【平台经济十二问】平台经济的创新价值、财富分化与监管难题¹⁵

黄益平¹⁶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李力行¹⁷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席天扬¹⁸

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

汪浩¹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沈艳²⁰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中国平台经济的特点与发展水平

沈艳：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应用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带来了巨大变革。中国的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面对上述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些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就平台经济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首先请黄益平老师介绍一下我国平台经济的

特征，取得了哪些成绩，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

黄益平：平台企业是什么样的单位？这大家可能都知道，是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这样的机构。但如果要给平台经济下一个定义，我想应该是依托于云、网、端三个基本要素，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支持撮合交易、传输内容并管理流程的新的经济模式。

15. 本文根据五位教授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平台经济专题”环节的对话内容整理。

16.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席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现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2018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为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Member of The External Advisory Group on Surveillance）。

17. 李力行：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2008）。曾获北京大学“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北京大学方正奖学金、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

18. 席天扬：北大国发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长聘）。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

19. 汪浩：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季刊）副主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20. 沈艳：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任理事。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平台这种形式在传统经济中就有很多，比如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学也可以是一种平台。然而数字平台有何不同？最重要的是它使用了数字技术，在规模、速度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突破了原有平台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与传统平台企业相比，数字平台在影响力、内容、速度和针对性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关于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即数字技术会给经济带来哪些改变？我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提升规模、提升效率和提升用户体验。“三降”就是降低成本、降低风险、降低接触。

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上述六方面应用的确可以给经济活动带来一些革命性变化。比如，平台经济让普惠变得更容易。过去大家常说，经济活动比较难做的就是普惠，在金融领域尤为如此。一般而言，金融普惠只能触及 20% 的客户，还有 80% 的客户很难触及。平台和数字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难题。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因此可以获得很多客户，在降低边际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门槛。比如城市里一些做零工的人、网店和其他领域的创业者，在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就能开展业务。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

如果把中国平台企业置于国际场景里，它们大概处于何种水平？

我国的平台企业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比如大家熟知的网易。然而今天较为知名的平台企业大都在 2003 年到 2004 年前后走向成熟。淘宝是 2003 年；京东成立于 1998 年，真正成长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则是在 2004 年。回首过去将近 20 年的时间，我国的平台企业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平台企业的总体实力排名第二。目前全世界平台企业的格局呈现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即美国、中国和世

界其他地区三足鼎立。

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全世界占到 100 亿美元以上市值的平台企业约有 100 家，这 100 家企业从数量上来看，中美两国占比很高；从市值看，美国企业占 70% 多，中国企业占 20% 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平台企业能在全世界范围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非常了不起。

我认为，中国的平台企业发展得比较成功，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我们的人口规模比较大，所以市场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市场比较大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品和业务，特别是平台经济，如果市场足够大就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市场太小则难度很大。

二是我国对数据和个人权益的保护等有法规尚在探索阶段，这对平台企业而言约束较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平台企业的创新空间较大。然而凡事总有两面性，平台企业野蛮生长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今问题也不少。

三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市场相对分离。如果全世界的市场融合到一起，中国还能否发展出如此大的平台企业，这一点存疑，因为美国的几家平台企业毕竟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我看来，研究平台经济没必要纠结于上述观点，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以前的利好很可能变成未来的挑战。与国际领先的平台企业相比，中国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不是特别突出。

二、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沈艳：刚刚黄老师提到平台经济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数字技术也让一些人失业，比如网上就有这样一个段子，一对卖菜为生的老夫妻，含辛茹苦地工作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程序员，写出了社区买菜这种平台经济程序的代码，最终让自己的父母失业。



我想请问李力行老师，平台经济到底会对就业和创业带来哪些影响？

李力行：数字技术的进步，包括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应用，的确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具体到平台经济，就是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连接了供给方、需求方和相关服务提供者，比如金融服务和配送服务。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让服务变得多样化，这其中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零工经济的盛行。

平台技术催生的“零工就业”模式让“打零工”变得切实可能，就业者通过一个APP就可以接单、获得工资收入和各种信息。

“零工经济”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线劳动力市场，包括在线翻译、咨询、画图、编程等。其工作成果通过在线方式提供，供需双方在线下一般不见面。二是基于应用程序的按需服务，在本地提供，但通过在线的方式获取订单，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我们最熟悉的网约车、闪送、外卖配送就属于这种类型。

两类“零工经济”的数量都很庞大。综合来看，第一类的独立性比较强，主要在线上完成工作，与客户不直接见面。第二类的独立性相对弱一些，但与传统的雇员就业模式相比，已经独立很多。

国际上的一些研究，以工作的波动性，获得收入的可持续性，工作会否被监督，就业者对下一阶段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预期等指标，从不同的维度判断人们的工作是零工工作、传统的雇员雇主工作，还是自雇创业。

有研究指出，由于零工工作极为灵活，通过传统的家户调查得出的统计数据可能失准，也就是说零工工作的就业数量往往被低估。

中国到底有多少零工就业者，关于这一点一直没有准确答案。因为零工就业是多样的、灵活的、非单一、非固定的。根据最新的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数已超2亿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极大的规模。我们在制定任何政策时都不能忽视这

部分人，必须对其加以重视。

与此同时，平台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创业选择。一方面，创业有风险，如果能通过平台接单并灵活地获得收入，有的人可能就选择不创业。但与此同时，零工就业也带来灵活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对冲了创业风险，可能使得更多人勇于尝试创业。

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就业和创业图谱。现在的就业和创业，除了传统的雇主、雇员和自我创业，还包括依赖平台创业、做零工、兼职、共享用工等。针对上述崭新的就业、创业类型，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

此外，平台对就业还有重要的赋能作用，比如平台可以给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农产品。一些残疾人也在平台的帮助下，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电话客服这一类的就业机会。

总体来看，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结构性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平台经济催生新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种创造性破坏。一切技术变革皆是如此，有人受益就必定有人受损。如何保护受损者利益，尽量减轻相应的冲击，这是政策制定者和平台经济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平台经济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沈艳：平台经济的发展引发全球结构性变革，好的方面是扩大了就业创业的图谱，同时平台经济也带来创造性的破坏，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可能更关注对弱者的保护，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席天扬老师，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无论国内国外，平台经济在促进公平公正方面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席天扬：平台经济的出现让我们对企业、市场和政府边界有了新认识。平台本身大多数情况下既是一家企业，又承担了很多市场基础设施的职能，比如在平台上会有很多小商户展业，因此平台需要制定一些基础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发挥公共服务和管理功能。

如何评价平台对社会治理的影响？首先要认同平台的贡献。日常生活中，我们拿出手机，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支付宝等平台，就可以连接公共服务部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通过手机平台提供面向当地居民和企业的政务服务，覆盖范围非常广，提升了便利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比如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弱势群体或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服务。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健康码、行程码等平台程序对疫情期间社会的平稳正常运行功不可没，不必因为个别时候的卡顿或瑕疵而否认健康码对于社会治理的贡献。

在疫情暴发初期，整个社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的信任网也变得非常脆弱。如果依赖传统制度和方法来管控这一风险，比如四处奔波开具行动轨迹证明或健康证明非常困难。哪些人群是安全的？哪些人可能被感染？如果没有移动平台提供的健康码等应用，一些地区只能通过户口、居住地、是否有房产、房产所有权、租赁合同等社会成本巨大的方式来甄别人群和管控风险，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可迁移性。所以健康码是以一种相对成本最低、较为公平的方式在短时间内重建了社会信任的现代治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从技术还是人文角度，健康码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而这些关键应用的底层技术正是由平台企业提供的。

当然，数字技术也会引发数字鸿沟问题，有些老人因不会操作健康码而无法乘坐地铁；前几天的一个热搜是一位老人因不熟悉相关操作，无法享受同等的购物优惠等等，过亿的阅读量，充分体现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

在我看来，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平台引发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平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痛点和需求，往往是价值创造的新来源。比如有些企业已在着手开发一些适老化的智能应用平台，我对此很乐观。

四、平台经济与垄断问题

沈艳：我觉得席老师提到的健康码贡献和黄老师讲到的降成本，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降成本的问题；平台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损失也是帮我们理解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平台经济除了几位老师讲到的好处，也还有不少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大家对于垄断的争论。

汪浩老师，根据您的研究和判断，平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利用规模经济，或者利用沉没成本来限制竞争？平台的这种做法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成功？

汪浩：关于平台垄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网络外部性问题。这实际上是个老概念，传统经济也有网络外部性问题。比如股票交易所，在交易所这个平台上投资的人越多，前来融资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融资的企业越多，投资者也越多，这就是网络的外部性，即用户越多，价值就越大。在传统经济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网络外部性，比如用一个电话网打电话的人越多，这个电话网的价值就越大。

与传统经济中的网络相比，平台经济不仅有网络外部性，还兼具其他特点。比如免费服务是平台特有的现象，还有平台的数据和流量。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可能使平台极有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效应。传统经济中，当某平台显露出赢家通吃的倾向时，政府就会介入干预。比如通讯行业很容易出现赢家通吃，这时政府会要求通讯网络间互联互通，即无论我使用哪家公司的通讯网络，我都可以给任意通讯网络的用户打电话。这是国家的规定，因此电信行业没有出现赢家通吃



的局面。

网络外部性还有另一面。如果某领域已经有一家企业在运营，其他企业想进入该领域就非常困难。这个不难理解，在网购、社交等领域，这一类型企业的网络外部性非常明显。一家企业进入某领域后，一旦对别的企业产生负面外部性，会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如果政府对平台经济完全不干预，确实有可能出现平台垄断。

沈艳：出现垄断的可能性有多大？

汪浩：我认为从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到答案。中国的大多数平台并没有形成垄断。比如网上购物，原来是阿里巴巴一家独大，现在有很多网购平台，竞争其实还比较充分。在外卖、快递等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竞争比较充分。当然也不排除在个别领域的确存在垄断的可能性。

我认为国外的平台垄断情况似乎比我们还要严重一点。美国有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程度更高一些，也有些互联网平台面临来自传统领域竞争对手的不断挑战。比如亚马逊，看起来好像是网购领域的垄断者，但它面临很多来自传统渠道的竞争。具体到某个行业，我们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

五、如何看待平台经济的创新模式

沈艳：汪老师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平台经济本身有网络外部性，有时可能导致赢家通吃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有关部门希望看到星辰大海、百花齐放的局面，希望平台企业走在创新的前沿。然而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平台通过大量烧钱，迅速形成市场规模，通过压低价格夺取市场，获得了市场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企业成功了，有些企业没那么成功。

请问黄老师，上述模式是否是好的创新？平台经济时代好的创新应该是什么样？

黄益平：关于如何看待平台竞争这一问题，

我想做些补充。汪浩分析得非常好，我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前面汪浩提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平台企业的普遍特征。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做得越大效率越高，范围经济就是平台做起来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一般而言，我们说的反垄断，反对的就是平台企业市场份额过高。不难想象，一旦平台企业市场份额过高，可能会反竞争、欺负消费者。所以传统观念主要看市场份额，如果一家企业占到50%-80%的市场份额，可能就容易被视为具备很高的垄断可能性。这应该是平台企业遇到的新挑战，过去未曾有过。

平台经济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对我们学者而言，就遇到一个两难问题，企业做得不好，规模就会很小，那就发展不起来；企业做好了做大了，可能有垄断嫌疑。

平台经济还有一个特征叫范围经济，这也是汪浩提出来的。所谓范围经济，就是一家企业做大后可以跨界做业务，这个现象很普遍。比如微信上有微店，抖音也想做外卖和约车。我们知道，如果平台企业规模太小就很难得到回报，因此企业必须做大。企业做大后担心存在垄断嫌疑，此时如果范围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带来充足的跨界竞争。因此汪浩认为范围经济发展起来后，可以在规模经济和充分竞争之间实现平衡。

刚刚汪浩也提到阿里巴巴，2013年阿里巴巴在电商市场领域的份额占比为92%，2020年这一占比为42%。这说明2020年时，阿里巴巴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垄断能力，因为如果阿里巴巴垄断能力强，别的企业根本无法进入电商领域。这就引出经济学中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可竞争性，即我们要关注的可能并非静态的市场份额，而是这个领域是否还有空间让其他企业也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关注该领域的进入门槛是否足够低。如果一家平台企业的发展令其他企业再也无法进入这个领域，这就是垄断。但如果一家企业规模做大后，其他很多平台企业仍然可以陆续进入同

样的领域发展，这家企业可能形成垄断的能力非常弱。目前中国的可竞争性还比较强，在现阶段，针对平台企业多制定一些行为规范可能更为重要。

以上这些都是汪浩研究得出的结论。

在我看来，在很多领域内范围经济都很活跃，带来很多竞争。但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任意一家公司几乎都能追溯到最后两三家大公司，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我认为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可竞争性悖论”。

沈艳提到创新问题，坦白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所有平台企业都是创新型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白手起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做到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如果不靠创新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

比如，在2010年时，支付宝每秒钟能处理300笔交易，今天大概每秒钟能处理50万笔的交易，这就是技术创新获得的成果。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支付宝、微信支付不可能成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能随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如此大家对大型平台企业仍有担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猎杀式并购”。很多大企业现金充裕后，四处购买那些创新公司。有的公司被买回来支持大企业自己的平台，有的公司被买回来后不再发展，因为大企业担心该公司再发展下去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对创新的未来发展可能带来何种影响，现在还说不清。

沈艳还问到该如何看待烧钱创新的模式。在平台创新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采用烧钱模式。比如一些网约车公司烧钱，看起来成功了，规模做得非常大。但也有一些公司烧了很多钱却没能成功，比如共享单车。烧钱到底好不好，真的很难说。

首先，烧钱烧的是大公司自己从市场筹到的钱，大公司自己愿意投资，这好像也没问题。然而总是这样烧钱，长远来看不可持续。我认为现在的专家对平台经济治理决策有一个解读，即当平台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否该把创新关注点放在

发展硬科技上，而不是简单的大科技。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再来讨论。

其次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有些平台企业创新，开始的时候很活跃，比如从一个用户积累到10亿用户，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然而积累到10亿用户后，企业创新速度就放慢了。将来企业的创新会变成什么样我并不知道，但我仍然认为平台企业就是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与国际大型平台企业相比，我国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给我国平台企业一个好的创新环境。这些企业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规则来规范其行为。长远来看，我们只有不断支持平台企业不断创新，才有可能令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如何看待平台“不大易输”“太大易坏”的难题

沈艳：现在的反垄断标准，看起来似乎“大的就是问题”。

黄益平：“大的就是问题”、“大的就是坏的”，其实是美国一个大法官提出来的。美国在1980年反垄断时，曾经试图甄别好的大企业和坏的大企业，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每家企业都具有多面性，无论从哪个方面判断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占据了主导，他们认为只要企业对消费者有利，这样的垄断就不是大问题。如果企业以高价掠夺消费者，那将来就会成为问题。

在平台企业的语境中，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平台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很多免费的服务，如果按照芝加哥学派的标准，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想汪浩老师可能会告诉大家，所谓的免费服务其实并不免费，美国的平台企业玩的就是这个套路。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认为“大的就是问



题”，对于这一说法我认为还是该谨慎些好。无论是市场份额、垄断、可竞争性、范围经济，所有这些标准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地说“大的就是坏的，大的就是问题”，这与平台企业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平台企业想要做好，就必须做大。

汪浩：我非常同意黄老师的观点。平台经济里，平台企业不做大是不可想象的，不做大就等于做砸了，成功的平台企业都是做大的。做大以后怎么办？有些企业可能形成垄断，有些可能只是安稳地做一家大企业，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借鉴电信行业的经验，企业之间实现互联互通。通过互联互通，企业可以完全保持自己的网络外部性。

比如现在只要能获得政府牌照，就可以成立一家小型的无线通信公司，规定自家公司的电话卡可以给所有人打电话。那么对于这家公司而言，就不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也没有网络外部性的问题。即使公司规模不大，也可以做得成功，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黄益平：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其实是享受了别人的网络外部性。

汪浩：对。刚才黄老师和沈老师都提到免费服务的事情。免费服务其实我平时用得很多，各种网络购物、微信都是非常有用的免费服务。我个人也是非常感激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服务。

如果要从学理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会知道网络公司提供这些东西都是必然的。网络公司其实也是企业，归根到底要追求利润。为什么这些企业像学雷锋一样，为大家提供免费服务？它必须这么做，就算A企业不做，B企业也会做，这就是网络的特点。你不这么做，别人就会替你做。

通过提供免费服务，这些企业能获得很大好处。消费者享受了免费服务，其实是在给平台企业帮忙。因为平台企业从中收集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在获得流量的同时，也能靠流量赚很多钱。在我看来，免费服务不是最好的，“负价格”才是最好的。比如一些大平台企业实行积分制，

消费者在平台上购物，使用积分可以换钱，这就是“负价格”。既然平台企业能给出“负价格”，足以证明它的盈利能力非常强，应该还有让利空间。

席天扬：在谈论网络外部性时，我们要注意区分这是由平台技术和商业模式本身带来的，还是单纯因为平台规模大而引起的。

目前，平台使用的一些技术和算法，可能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诱导消费者的倾向。其实小平台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并且小平台的行为可能更难以监督。小平台目标小，不容易引起注意；大平台则不同，其一举一动可能都在公众注意力和政府监管的视线范围内。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大家都在讨论社交媒体上的诱导性信息及其对用户数据安全的影响，甚至认为脸书利用这些程序影响了用户的政治行为。但在我看来，恰恰因为脸书在美国是一家独大的社交应用程序，它才受到这么多的政府监管部门的法律“照顾”，才会变得更加规范。如果美国有几百家小型社交媒体同台竞技，同样会存在类似的问题，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怎样建立一个规范性的监管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注意力放在区分“大”还是“小”上。

沈艳：席天扬老师的意思是，“小的也可能有问题，小的也可能是坏的”。从三位老师的分享来看，“大的就是坏的，就是问题”这一观点是不是也与政府的强弱有关。如果是小政府、弱政府，是不是控制平台的能力相对也弱？

黄益平：回顾过去100多年来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因为其政策框架比较成熟，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状态，有时很活跃，有时则无人问津。我们认为，倘若经济增长减速、行业高度集中、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老百姓对大企业的反感度会明显上升。低收入人群的日子特别不好过，这时候还有一群人赚钱很多，动辄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公众的情绪很容易激活反垄断政策。

2021年9月的上海外滩峰会，沈老师主持了一场讨论。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到，监管只管大的就行，小的不用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小的企业也会有很多问题，因此更重要的是规范行为，无论是否存在垄断，每一家企业的行为都要规范。比如大数据杀熟，大平台和小平台都可能有的。

接下来我给沈艳老师提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大数据杀熟？

七、平台经济与大数据杀熟问题

沈艳：我在课题里承担的是大数据杀熟以及相关数据治理方面的研究。在平台经济的大背景下，大数据杀熟之所以发生是有原因的。

平台既想让消费者提升效率、同时又要保持好的体验，为实现上述目标，必定要用到预测分析的手段，把最适合消费者的信息送到。一旦平台这样做，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即每个消费者看到的信息不同。这给人的感受有时就是大数据杀熟。比如我和我妈妈打车去同一个地方，我们最终支付的车费价格可能不同。

我们也要认识到，大数据杀熟体现了技术的进步，是平台在提供更好消费体验时的副产品。监管者也需要在规范平台行为的同时，帮助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

此外，平台自身也需要强化其算法的可解释性。对平台而言，针对每位消费者的个人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成本的操作，不能利用算法对消费者杀鸡取卵。

事实上，美国也是通过发展的手段来解决类似问题的。比如Uber在动态定价方面做得比较好，它可以预测某个消费者的喜好，甚至提供一些其他的选项，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定价不同的服务。在我们的研究中也会提供这方面的具体治理思路和对策建议。

八、平台经济与共同富裕

沈艳：我想继续询问李力行老师关于“大的就是坏的，就是问题”的看法。平台在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能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造成财富过度集中？如果有，什么措施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力行：收入分配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特别是《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在全球都引发了关注。这本书认为自二战以来，各国都出现了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相对下降这样一种长期趋势。在美国，由于全球化和收入份额变化，导致出现一系列对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反思，甚至导致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转向。这些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

具体到收入分配问题，有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其他国家那么明显，当然这一点还有待更细致的研究。

平台是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它是一种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而在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中，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对上升。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份额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也有所上升。

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如果要应对负面影响，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鼓励创新和发展，让发展的红利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渠道惠及更多受负面冲击的群体，而不是遏制技术进步。

沈艳：最近有一组数据提到，2020年美国排名前1%的富人，其年度收入占比是27%，已经超过中产阶级26.6%的收入占比。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一种收入份额占比的变化。

席天扬老师，从国家治理、公平公正等角度来看，面对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份额占比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该做些什么来促进公平？

席天扬：技术进步加速了社会经济的转型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可能有一种普遍感觉,即社会的财富越发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技术创新带来的收入分配变化,其特点可能对财富排名前1%或10%的有利,对普通劳动者也比较友好,但却因社会流动性下降而给中等收入阶层带来焦灼感。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中提到的那样,“我们不断地奋力向前,逆流而上,但总是回到了起点。”但即便代际流动使得不同的人群回到起点,经济发展的历史像是一部人类不断被机器和技术打败的历史,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得到了赋能和升华。

或许我们该换一种眼光来看待社会流动性,因为社会流动不可能一直遵循所有阶层始终向上流动这一种模式。新的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经济机会,低收入群体因此得到更多机会,这是平台创新发展带来的积极方面。

平台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电商平台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收入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可以尝试通过数字税、平台公益基金等方式,帮助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让快速增长的红利为全社会共享。

黄益平:前面我提到,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减速、行业集中度提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这三重因素叠加,老百姓对大企业的反感度会明显上升。

其实把这三点放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情况也适用。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行业集中度提高、收入分配不平等突出问题。

在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方面,平台的两面性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平台具有很强的普惠性,比如有聋哑人夫妇在大城市做外卖骑手,如果没有平台企业,他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平台的长尾效应,我们的财富变得过度集中,最后给中间阶层的生活带来很大挑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我认为,目前针对平台的治理政策,首要重点是不是反垄断?这一点值得商榷。

刚才汪浩提到,在很多领域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止降低进入门槛,要减少沉没成本,这意味着改善所谓的可竞争性还是必须要做。但如果在可竞争性很强的情况下,反垄断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规范平台企业的行为更加重要。平台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之所以能控制风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平台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平台对其用户还是非常了解的,这也是平台能提供效率、提供很多机会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平台的存在反而提升了用户、消费者和其他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要防止平台的不公平的竞争行为。因此,我认为规范平台行为可能是当前最重要的。

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平台治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在平台治理中能做什么?

一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也就是在市场分配中搞好监管,保护公平竞争,反对那些不规范行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收入在各个群体间按市场规律进行有效的分配。

二是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可以收税,但我国现在没有设立这方面的税种,尽管很多平台企业也在交税,但很多线上活动是没有纳税的,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一个“双支柱模式”,有10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相关协议。

其中,第一支柱就涉及各个市场间的税额分配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欧盟的很多数字经济都是美国公司在做,因此在美国看来,既然是美国的公司,当然要收税。然而欧盟却表示,虽然是美国公司,但其市场、数据和业务都在欧盟,税收都被美国拿走,这根本不合理,因此需要重新分配。

第二个支柱是要防止税收套利,保证有一个最低税率。各国共同保证一个最低的税率,否则

平台公司有可能远离税收高的国家，转而投奔税收低的国家，这种税收套利的行为可能带来很多扭曲。对我国而言，我们还需加强研究，尽快出台针对线上活动的税种，以此促进公平竞争，促进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公益。我认为平台企业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平台企业兼具监管市场和企业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规模很大，因此许多人认为平台企业要做负责任的企业，应该主动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包括给消费者、竞争者提供相对有利的条件等。这有助于平台企业的长期发展，同时还能帮助建立社会公益机制。

简单来说，共同富裕的三个方面，都可以在平台企业中落地。

九、平台监管与“二选一”问题

沈艳：请问汪浩老师，你怎么看平台经济中的“二选一”？监管者怎么做才能算是恰当的应对？

汪浩：“二选一”是我国反垄断特有的现象，最近比较大的两笔罚款也都是跟“二选一”有关。

其实在传统经济里也有类似“二选一”的现象存在。比如一些上游企业要求零售商不要卖他们竞争对手的产品，这一做法类似“二选一”，但本质上有所不同。传统经济中的“二选一”，大部分情况是上游制造商要求零售商不卖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只能卖我的产品；但平台经济中的“二选一”，是要求零售商只在我这里卖，不要到别处卖。这两者间还是有一点区别。

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明确规定，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能禁止经营主体跟别人进行交易，因此“二选一”是违法的。那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成为合理的理由？平台采用“二选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打击其他竞争平台。特别是规模较大的

平台，一旦经营者选择在该平台卖货，其他小型平台就很难发展起来。这样的行为明显妨碍了平台的发展，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

跟传统经济一样，平台经济“二选一”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有时商户会主动找到平台，让平台帮忙推广商品并引流，作为回报，商户选择只在这家平台开店，不去别的平台开店。平台也要求商家做出承诺，一旦品牌做出了知名度，商家也要继续留在这个平台。因此双方都有互利的动机，愿意签订“二选一”的合作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禁止这样的“二选一”，实际上打击了平台和商户间的合作意愿。平台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流量替商家包装商品，一旦品牌做大，商家转投别家平台继续经营，该平台岂不是替别人做嫁衣？

我认为，“二选一”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平台企业大范围地制定一项平台政策，比如规定商家只能到本平台开店，不能到别家平台开店，这可能是反竞争策略。但如果平台与商家签署一对一的互利协议，这本身没有排他性。如果商家与平台合作把品牌做大，这本身对社会也做出了贡献。

十、平台经济与新型劳动关系

沈艳：请问李老师，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监管者该怎样做，才能让弱势劳动者得到更好的保障？

李力行：我国现行的劳动监管属于劳动二分法框架，即劳动者要么从事独立性劳动，要么从事从属性劳动。从属性劳动要求劳动者与雇佣者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适用《劳动合同法》；独立性劳动则规定劳动者与雇佣者是民事关系。我国现行的医保、社保、五险一金等，这些劳动保障都是依赖于雇员雇主的劳动关系而建立。

目前，许多零工工作的性质介于独立性劳动和从属性劳动之间，所以无法完全匹配以往的劳



动二分法的框架。由于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当发生一些零工劳动者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时会出现无人承担责任的情况，引发社会大量的关注。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零工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组织结构出现了去组织化、去公司化的变化。目前，热衷灵活就业、独立就业和零工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样的劳动关系的变化，有美国学者提倡建立脱离雇主、独立性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建议政府减少对由雇主提供保障的补贴，以保证劳动者能够公平获得保障。这意味着，应当尽量让劳动者享受劳动权益保护和一般性公共服务的权利，能够不依赖固定就业单位就能获得，不因其就业身份的不同而有差异。

我国的应对思路是该进一步强化劳动关系，还是顺从技术变化将不同的劳动权益和保障进行解绑、便利零工劳动者获得最紧迫的保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最近几个月，国家的政策出现新变化，人社部明确提出了第三种劳动关系，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相关部门在广东等地进行了试点，让零工劳动者能够独立享有工伤保险。我们应该探索新的服务模式，支持平台帮助零工劳动者获得更多保险保障。

十一、平台经济与监管创新

沈艳：请问席天扬老师，平台对监管提出新挑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你对监管有何新建议？

席天扬：平台经济与传统产业有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平台经济的核心技术是算法，最重要的资产是数据。但已有的监管框架和制度往往是针对传统经济的物质资本和有形资产而设计的。目前监管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立法和监管政策出台的速度。

我们需要在针对平台经济的理论研究层面有

所突破。比如什么是数据？沈艳老师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曾提出算法审计和数据确权。再比如，只要是平台经营产生的与用户有关的信息，平台是否百分百拥有所有权？平台利用大数据产生的匿名化信息，由此推算哪些产品在哪些地区的销量比较好，在此基础上向消费者推送，这算不算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我认为数据确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状态，有很多中间状态，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给出定义。

十二、平台经济与国际竞争

沈艳：最后请问黄益平老师，为了帮助中国的平台企业更好地发挥国际竞争力，监管该怎么做才能平衡好国内需求和国际发展间的关系？

黄益平：无论监管还是治理，总目标应该是促进平台企业有序发展，要支持中国平台企业进一步创新。

中国平台企业规模虽然做得很大，但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这些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参与国际竞争也是早晚的事。对于这些平台企业，我认为应该鼓励，为其进一步创新进步创造好的条件。

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有序发展，二是共同富裕。我认为，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有的政策应该围绕实现这两个目标展开。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平台经济都是新生事物。如何治理监管一个新生事物，本就没有成熟的框架。最近国家开始对平台企业加强监管、改善治理，我认为这是好事，但有些做法也值得探讨。

我个人认为，运动式监管不好办法。对于平台，有问题就纠正问题，有贡献也该肯定贡献。我们更需要一种成熟的监管框架，初步建议是建立一个相对综合的体系，既有法律也有自律。监管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要改变运动式监管模式，提倡日常性、回应式的监管模式。平时监管

部门和平台企业可以一起探讨分析,哪些是问题,哪些不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想办法解决,不要等问题变大再重拳出击。

数字金融里有个做法叫监管沙箱,主要指的是监管和业界一起合作,共同考察一些新业务。平台企业里也可以尝试这样的做法。凡事一旦上

升到法律程序,一般都会力度很大、非常严厉且耗费时间比较长。当初,针对微软垄断的司法程序足足走了20年,但20年后的数字经济领域,早已时过境迁,当年的问题现在也不再是问题。

我们建议慢慢地建立一个成熟的、综合性的、日常性的监管框架。



中国特色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及 2022 年就业形势²¹

卢锋²²

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当前形势下讨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考虑。

一是我国决策层一直高度关注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首”。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到，“六保”中最重要的“三保”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政策意义。

二是我们在多年前一项专题研究中，针对教科书“奥肯定理”²³不能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现象，提出广义奥肯定理分析视角来研究我国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就业与宏观波动之间联系。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经历改革时代罕见的短期波动，有必要结合最新情况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基于广义奥肯定理的分析思路，从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转移、新增城镇非农就业等方面综合观察讨论疫情期特殊宏观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走势特点，并依据经验观察结果提出目前我国就业恢复尚不充分的初步看法。然后分析就业恢复不充分对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制约性影响，并就2022年就业形势以及宏观和就业政策应对提出几点探讨性看法。

失业率能反应经济波动，但有局限性

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近年失业率数据表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失业率波动显著，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做出了与理论预测关系相一致的反应，说明失业率与宏观波动更加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联系方式。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

另外，在失业率统计、宏观含义及相关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例如从失业率省区分布来看，一般理解全国失业率理应是各省区加权平均值，然而数据显示全国均值与各省区数据排序的中位数相差甚远，提示各地统计上报登记失业率受激励机制影响可能存在某种非随机性偏差。

又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相对于失业人数显著偏低。2020年失业保险金发放额大幅增长，

21. 本文根据卢锋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59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的演讲整理。

22.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创始主编。目前担任财政部、人社部顾问和国际组织AMRO咨询组专家成员。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博士。

23. “奥肯定理”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经验关系或规律，比如在一定观察样本期内，失业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下降某个百分点；反之亦然。

体现失业保险应对经济收缩冲击的积极作用；然而保险发放人数相对失业人数仍显著偏低，失业人中领取失业金人数占比甚至略有下降。可见失业保险支持民生作用仍有待提升。

多年前我们研究劳动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时注意到，改革时代我国失业率两次峰值主要是知青回城与国企改革推进伴随较大规模员工下岗有关，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关联性较弱，因而把教科书“奥肯定理”简单套用到中国会“水土不服”。这两年失业率指标先升后降，呈现与宏观波动反向变动的合乎经济逻辑关系，然而仍需关注失业率在显示与宏观波动相联系的凯恩斯类型失业方面可能存在局限，避免仅用失业率评价就业形势可能带来的过于乐观的偏颇。

劳动力转移与宏观波动的关联更显著

教科书奥肯模型无法解释中国相关经验，不等于说我国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与劳动力市场注定不存在显著联系。多年前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分析二元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涨落之间联系，需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这个结构因素，形成可称作广义奥肯定理的分析框架。

用农民工衡量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总量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然而该指标年度增量波动挺大，并且与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可见我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增量伸缩变动来吸收或者消化，这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起飞发展转型在奥肯关系方面的最为突出表现。

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罕见下降，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绝对减少数量约为520万人，是改革时期这个指标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更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伴随2021年宏观经济反弹恢复，农民工增量也相应大幅回升，从前三季度

数据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万上下。这说明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

2021年农民工增量预测值大幅反弹并有望基本恢复到2019年水平，然而仍未能补偿这两年本来应该发生的农民工转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为过去两年农民工本来应发生增量的理论估计值，可以得到没有发生疫情假设下2020和2021年农民工总量变动趋势值，过去两年农民工实际总量与上述估计值约存在600多万人的差距或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202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

农民工转移减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双重不利影响：一是从总量上看，农民工转移减少通过务农收入与打工收入预期差抑制收入增长，估计2020年这方面收入影响规模在千亿元以上。二是从结构上看，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下降对收入增长影响较大。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本地农民工工资高20-30%，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下降抑制收入增长影响应在百亿元以上。

新增城镇非农就业也是重要观察变量。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从2019年1352万人降到1186万人，降幅12.3%。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如果考虑10月份增加的88万人则已达到全年目标值。但是该统计值2021年2季度后逐月回落，尤其是10月降速进一步加快，估计全年比上年会显著增长，但是仍比疫情前2019年低大约9%。这也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充分。

就业复苏不充分的宏观影响

就业恢复不充分是疫情冲击和特定政策环境下宏观增长不及预期的产物，同时它又会反转影响收入和消费增长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年我国外需再次出现与世纪初年可比的超预期高速增长，可见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增长疲弱是新



的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除了疫情因素外，消费疲弱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复苏不充分环境下收入增长不及预期，这又与就业恢复不充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2020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到1.2%，低于世纪之交和金融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居民收入部分得益于“转移收入”超常增长，实际收入增速降低到3.8%，探底深度仅次于世纪之交农民收入增速低谷。与2021年宏观经济大幅回升相一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双双大幅回升，分别达到8.7%和11.2%。然而季度数据显示收入增长后续动力不足，表现为2021年2季度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快速回落，3季度名义收入增速已经回落到不足6%，实际收入更低，4季度可能进一步探底。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3.8个百分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增长最糟糕年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维持2.9%增长，低位水平仅次于世纪之交零值增速低谷水平。2021年消费出现恢复性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城乡消费名义支出增速分别反弹到14.2%和18.5%。不过2021年的二、三季度农村和城镇消费增速先后从最高点走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城乡消费增速在2021年四季度可能会进一步走弱。

又如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数据显示，2020年零售月度实际同比增速在年初疫情爆发最严重阶段垂直下落近24%。后来随着疫情大范围流行得到控制以及经济和收入的复苏，零售总额增速也持续回升，最高达到2021年1季度超过30%的高位。然而此后零售增速掉头向下快速回落，9-10月跌落到不足2%低位。另外春节和国庆节两个传统消费活跃时点，疫情未得到彻底控制环境下这两个节日消费更是难以顺利复苏。

2022年就业形势与政策探讨

展望202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第一

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创纪录水平，加上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和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给定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任务繁重会对就业创造构成宏观制约。因而2022年劳动市场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由于1962年出生人口大幅上升，2022年预期退休人数上升增加释放就业岗位会一定程度缓解就业困难，然而可能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总体紧平衡局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不充分矛盾，需抓紧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取向的货币、财政、结构政策，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相关部署，相信后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举措会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从我国近年经济运行和政策实施情况看，也需总结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提升政策协调水平和综合效率。

例如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层面需要把握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针与实现潜在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经济政策着力点要在保证现实经济增速贴近特定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时，就需要避免采用实际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又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加强管理和管制。即便是必要的管控政策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状态，因而不同程度地具有就业含义。有关部门在推出力度较大的管制政策时，也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统筹兼顾优先就业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方针，通过优化监管和管控政策以减少就业损失，避免对经济增长造成局部过大冲击。

再如跨周期调节或调控是宏观政策部门提出的一个新方针，意在在疫情期宏观经济较大起伏的特殊形势进行跨周期调控，以实现经济运行更为平稳有序目标。跨周期调控建立在对某个未来时段的下个周期阶段预期会出现的经济形势特点为前提，因而对有关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准确性

要求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如果预测偏差较大，合理的调控意图就难以实现，甚至不能排除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而需总结经验提升预期准确性和跨周期调控科学性水平。

还要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在目前经济面临下行走势形势下，更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吸纳就业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并促进就业岗位创造。尤其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扶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增信等措施为其“减负”、“输血”和“赋能”。

国内外经验都显示，通过直达家庭与个人的定额转移支付，是应对疫情冲击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内疫情间歇性散发和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根治前新常态环境下，需要在总

结早先各地发放消费券、抵扣券等补贴政策实践经验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补贴政策力度。在总结数字人民币（e-CNY）冬奥会大范围应用场景测试经验基础上，可考虑财政或社保资金通过数字人民币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一次性（或有限次）发放较大规模收入补贴。

针对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就业重要性持续上升趋势，加快推进对新业态就业人员养老、医保、失业保险普遍覆盖。对“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并通过开发临时公益岗位等实行托底帮扶。另外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普惠性与民生托底作用。



对房产税改革的几点看法²⁴

赵波²⁵

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

自 1998 年房改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全国人均居住面积达 46 平方米，住房拥有率达 83%(CFPS,2018)，这些数字比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就居民财富来看，住房资产已经成为我国居民财富中占比最大的资产。据社科院数据(李扬等, 2020)，2019 年我国住房资产总值已达到 GDP 的 2.3 倍。

随着房地产快速发展，房价过快上涨刺激了相关行业的大量投资(建筑、房地产及其上下游投资)与过多的信贷投放，因此挤出了实体经济投资，同时加剧了社会财富分化，特别是加大了租房者与住房拥有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过去五年，中央一直强调“房住不炒”，出台了调节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相关政策。供给方面，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发展长租市场”“建设保障住房”等政策。需求方面，调控政策主要体现在交易环节，包括实施限购、限贷、交易税、契税、所得税等措施，目前对持有环节的调节政策是缺失的状态，房产税改革的推行将填补这个方面的缺失。

我国房产税改革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2021 年 10 月 19 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为期五年。同时，财政部对其做了说明，“进一步深化

试点，可以强化需求侧管理，稳定市场预期”。

房产税除了作为需求调控的政策还有其经济学含义。住房作为私有财产，其价值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除了购房者需求、土地供给等常见因素外，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交通、环境等公共品也会使局部地区的住房价值上升。因此，当住房拥有者所获得的房产财富增值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时，住房拥有者就需要为政府承担一部分成本。而收集房产税的目的，主要就是用于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公共品质量，提升居住品质，进入良性循环。

房产税的两种方案

目前，我国针对房产税试点并没有出台具体细则，现考虑两种不同的方案。

方案一：广税基 + 统一税率

这一方案是对所有拥有房产的家庭实行低税收。基于我国 2019 年房价收入比，房产税如果以 0.6% 的税率计算，房产税总额将占 GDP 的 1.4% 左右，规模相当于消费税或者个人所得税，但远小于土地出让金的规模。

这种方案看似做到了征税标准的公平，即每个家庭面临同样的边际税率，但由于忽略了家庭

24. 本文根据赵波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 59 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的演讲整理。

25. 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北大中国工商银行经济学优秀学者奖、北大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学博士。

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差异性，无法实现财富有效的再分配，得到的社会总体福利不是最大的。

各项财政收入	占GDP比重 (2019年)
0.6%的房产税	1.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3%
国内增值税	6.3%
国内消费税	1.3%
企业所得税	3.8%
个人所得税	1.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4%

方案二：窄税基 + 累进税率

这一方案只对拥有一定市值、套数、人均建筑面积以上的部分家庭征税。

在该方案下，我们对几种情况分别做了估算：

1. 对所有住房市值大于 300 万元以上的家庭征税。按照北大社会调查中心 CFPS 数据，这部分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4.5%，所持有房产占社会总房产财富值的 31.9%，所持有资产（房产 + 金融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 28.6%。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富裕家庭集中拥有了大量房产，这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美国的富裕家庭会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

可能性方案	占家户比重	占总房产比重	占总资产比重
所有住房总市值 > 300万元	4.5%	31.9%	28.6%
拥有房产套数 >= 3套	3.9%	15.6%	13.9%
自有住房且人均建筑面积 > 60平方米	16.2%	14.1%	14.0%

2. 对拥有 3 套以上（包括 3 套）房产的家庭征税。这部分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4%，所持有房产占社会总房产财富值的 15.6%，房产财富值较低，所持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 13.9%。

3. 对自有住房人均建筑面积大于 60 平方米的家庭征税。这部分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16%，所持有房产占社会总房产财富值的 14.1%，房产财富值较低，所持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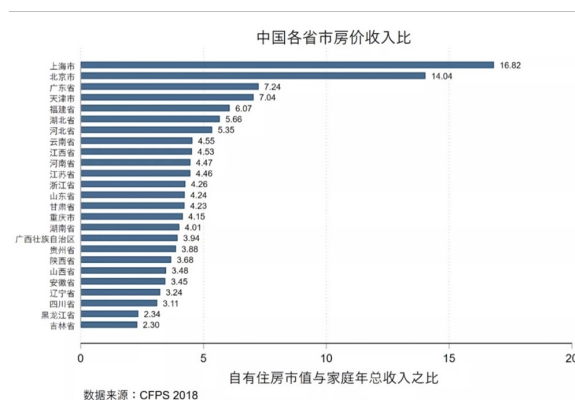
该方案创造的财政收入有限，但由于税基变窄，税率变得具有累进性，可以发挥财富再分配的作用，特别是按总价征收的情形。而仅仅依据套数或者人均面积来征收，很可能造成累退的结果（比如低总价、大面积的住房缴税更多）。

综上所述，最优税基和税率的制定应该兼顾公平和调节财富分配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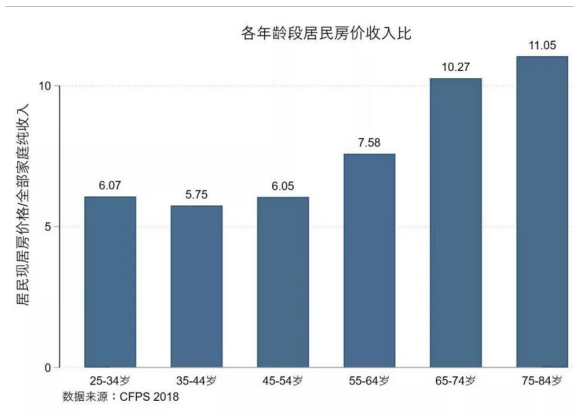
税收负担的分布

房产税的税负收入比与房价收入比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首先，分不同地区来看。按照全国各省（直辖市）不同情况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直辖市）的房价收入比较高，这些地区的家庭房产税支出会在家庭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一定程度上加剧低收入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其次，分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来看，从年轻人家庭到老年人家庭，房价收入比基本上是递增的趋势，老年人家庭的房价收入比最高。这是因为退休以后收入逐年下降，而房地产资产基本保持不变（很多时候房地产作为遗产留给子女）。所以对于老年人家庭来说，房产税可能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显著降低其可支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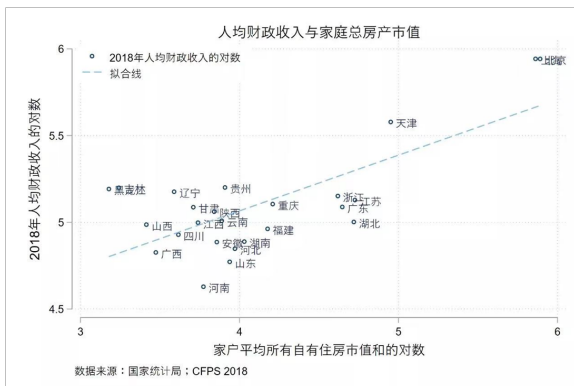


总之，在房产税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税收负担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人群间的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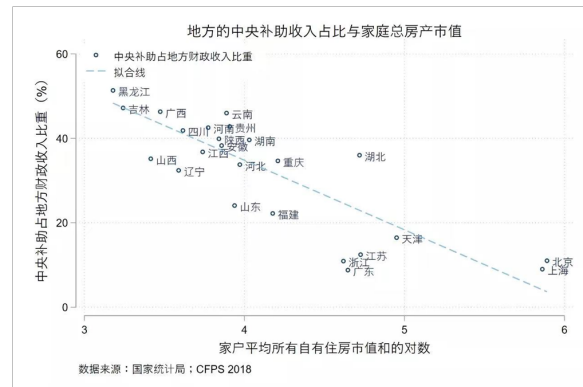
房产税与财政收入的分

房产税一般由地方征收，但其税收收入是由地方留用还是中央统筹呢？西方发达国家很多是将房产税留给地方使用，我国是否应该同样将房产税留作当地使用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目前我国还存在比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通过分析我国 2018 年各省份（直辖市）人均财政收入数据发现，人均财政收入与家庭平均房产总值成正比、中央补助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与家庭平均房产总值成反比。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省份人口流入较多、房子需求较多，导致房价大幅上涨。同时，这些地方的经济有活力，政府的税收也较高。



由于家户平均住房市值高的省份经济更活跃，地方政府财力雄厚。如果这些地方按照房产市值征收房产税并用于当地建设，就可能进一步加剧全国各地区公共品提供的差异，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而如果房产税由中央统筹使用并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则可以减少各省市公共品提供的差异。



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首先，对房价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就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得出统一的结论。已有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的实际效果，发现房产税对重庆的豪宅可能略有降价作用，但对上海的住宅价格却没有太大影响 (Du and Zhang, 2015)。国际上对房产税影响房价的研究，也是得出“混合”效果的结论。因此，如果将房产税作为调控房价的工具，其效果并不明确。

其次，对消费的影响，取决于征收房产税的具体方案。如果是“宽税基 + 统一税率”方案，那么房产税会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居民的消费。如果是“窄税基 + 累进税率”方案，那么房产税会促使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且由于低收入人群储蓄率少，高收入人群储蓄率多，社会总消费可能会上升。

第三，对投资的影响。房产税本身对房价的调节作用有限，但是它可以起到稳定房价预期的

作用，增加投机性买房的成本。稳定的房价增长预期又会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决策，使得新建房地产投资减少，最后引导投资重新进入实体经济。从长远来看，房产税还可以减少房地产泡沫风险，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综上所述，房产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具体的税收政策，需要充分考虑不同

地区人群财富和收入的异质性。因地施策、制定各地征收标准并由中央统筹分配使用房产税，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公共品提供的差异。就长期来看，房产税对稳定房价预期，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会有促进作用。此外，为了帮助中国居民的资产重新再配置，还需要其他政策配套，如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丰富居民的多样化投资机会等。



宏观经济“三重压力”的诊断与应对²⁶

伍戈²⁷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三重压力”一词出自2021年12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肯定前期特别是疫情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提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不足、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问题。

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经济研究者可能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提法涉及供给、需求、预期三要素，几乎把宏观经济可以探讨的所有问题都包含进来了。但普通人可能对这个提法还有一些困惑，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先控制住疫情、率先恢复生产的国家，为什么反倒在今年下半年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呢？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清楚地看到，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季调后环比为0.2%，近乎零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宏观经济肯定是有压力的。但到底该如何看待“三重压力”，又该如何应对？我们来简要剖析“三重压力”的根源所在，以及可能的政策应对。

一、供给侧收缩受能源调控影响

从供给侧来看，冲击主要来自工业生产等领域，包括前期缺煤限电，之后又实施能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双控。

从具体数据来看，这次产能利用率下行的幅度，也许比上一轮2017-2018年的供给侧改革时期还要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价格上涨并非由于需求面好，而是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导致。可见，来自供给端的掣肘力非常强。

幸运的是，近期缺煤限电因素在改善，这得益于“保供稳价”。但是这并不代表双控目标的完成。也许是考虑到经济减速的因素，之前受能耗双控影响的开工率得到阶段性缓解，问题并未根本性解决。展望2022年，我们也担心能耗双控措施如果不合理运用，今年下半年的经济问题是否会再次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可再生能源以及原料可以不计入能耗的总量目标。也就是说，过去计算能耗总量会把新能源部分也算进去。按照如此制度安排，也许2022年开始新能源就不算入总能耗。从供给约束而言，这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2021年单位GDP的能耗目标是下降3%，如果把新能源部分去掉，大概可以进一步促进下降1个百分点，2022年可能下降更多。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考核能在2022年更科学，单位GDP能耗特别是能耗双控的约束应该会得到明显改善。

26. 本文根据伍戈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59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的演讲整理。

27. 伍戈：经济学博士。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曾获得浦山政策研究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远见杯”中国经济、全球市场预测双冠军，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更重要的是，如果 2022 年的经济不像 2021 年这样大规模依赖出口，降低单位 GDP 能耗也许更容易。历史数据显示，单位 GDP 能耗、出口增速 / 名义 GDP 增速，二者之间是天然吻合关系。如果 2022 年不再进行一刀切式的做法，执行和目标两个层面来自供给端的约束也许都会比 2021 年好很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长期问题被彻底解决，本世纪末将地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其实是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压力不仅来自全国，也来自全球。

二、需求侧走弱与地产相关

从需求来看，2021 年下半年需求端走弱与地产有关系。

海外债券违约，使海外投资者包括美国财政部官员都开始关注中资的美元债，特别是房地产面临的风险。客观来讲，过去确实有一些房企野蛮增长，从时间点来看，房地产风险与监管强化两者也似乎有关联。为此，我们一方面更担心地产风险，另一方面也发现房企的行为在这一轮政策中确实明显异化，即房地产企业在库存很低的情况下既不拿地也不新开工，这在过去十几年没有出现过。既然库存很低，按道理，房企应该有很强的拿地意愿，但是这次没有。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到 2022 年某个时候，我们可能要一方面担心投资和销售下滑，另一方面发现房地产市场上确实没有库存或者库存很低。果真如此，可能还有一定的房价上涨压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滞胀”。目前低库存情况下，地产开发企业如果持续“躺平”，2022 年的调控挑战可能更大。

房地产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客观要求。我个人认为，目前房地产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还是要化解风险。现实也是如此，某些头部企业违约后，中央、地方和房企自身形成

的三方力量都在介入。只是三方博弈的过程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快，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要稳住地产，另一方面也要在化解地产风险的同时防范企业道德风险，两者兼顾需要多方参与和博弈。目前有些企业有获得救助的迹象，但是投资者所担心的爆雷风险还没有完全消失。

第二步才是地产的常态发展。历史上按揭贷款逐步放松后，地产可能转暖，现实情况也显示，多地最新下调房贷利率，这也意味着销售可能趋稳。当然，地产如果要对经济正向的拉动，也许要到 2022 年二季度之后，因为对地产商在制度性的约束方面（如“三道红线”）要达标的话，至少要等到 2022 年二季度。

总之，2022 年想要实现经济企稳，地产也许还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预期不足有待明确信号

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还提到预期问题。过去半年内，在疫情依然没有结束的情形下，地产、平台经济、教培等领域遭遇了各种冲击。总体而言，政策或监管的初衷都非常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些结果未能预料到。

目前投资行业的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预期，并不乐观。很多投资者对未来能投什么、不能投什么，投资方向上哪些“亮红灯”、哪些“亮绿灯”，如今都不是很明晰。

信心和预期比黄金更重要，除了供需两方面正在纠偏，还有更重要的事是让投资者、民营企业主体都能清楚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边界。如果这个边界不明确，他们进行跨期投资就会很迷茫。

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过程中，当前执行层面还有待释放更具体的信号，这样才能促进供需双方更好地纠偏，从而实现 2022 年更高质量的发展。



对话 |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的难点与政策的新意²⁸

卢锋

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赵波

北大国发院长聘副教授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黄卓²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信号

黄卓：对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赵波：我印象最深刻的内容是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这一点。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养老金保障都比较分割。我们有大量流动人口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现有公共品的提供模式导致流动人口无法在常住地享受到这些公共服务。比如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规定外籍人口不能在工作地领取失业保障而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不过，现在上海、北京都在改善，对于满足条件的流动人口，上海实行按月领取，北京可以一次性领取。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如此。这些是全国范围内都很

期待的改革。只有把这部分配套改革真正落实，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消除人口迁移的壁垒，劳动力要素才能真正流动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也使得人民共享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伍戈：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一句老话，隔了这么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了 2021 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客观来讲，这句话是在经济“三重压力”总体比较大的时候再次提出。背景是国内外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还有一些困惑。重提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大家信心的重塑有帮助。

卢锋：年度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有针对性新精神，在 2021 年极为特殊形势下，这次会议让人感到新意更多。

例如把经济形势困难和挑战表述为面临“需

28. 本文根据四位教授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 59 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的对话整理。

29. 黄卓：北大国发院副教授（长聘）、发树学者、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曾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最佳博士生候选人论文奖”、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教学优秀奖、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优秀班主任”称号、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金融青年科研优秀奖”。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个系统概括超出了早先学界和市场预期，显示决策层对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知。

在应对方针上也有很多新内容。除了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合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要求适度超前搞基建等等，预示明年稳增长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较大力度举措。

会议对形势分析和政策部署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上升对更高层层面的阐述和要求。比如强调要敬畏历史和文化，慎重决策、慎重用权等，注重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涉及到规律性问题。又如还提出要加强对经济学等方面知识的学习，这也给北大国发院这样经济教学研究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增强市场预期？未来出口会升还是降？

黄卓：请问伍戈，当前市场环境下，哪些政策或市场信号会显著增强人们、特别是民营企业对未来经济的预期？

伍戈：我们可以从周期性、结构性两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

从周期性而言，我们固然要跨周期，但是也要逆周期。特别是在经济压力比较大、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逆周期或者跨周期政策都要加大力度，但是又不能“大水漫灌”，把握好度很重要。如果财政和货币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而且力度能上来，经济状况就会好转，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会提高，失业率也会下降，大家的信心自然会上来。

更加复杂一点的是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民营经济领域。过去几年，中央一直传递出非常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可是，为什么如今民营经济又有顾虑，或者对投资方向迷茫？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非常重要。防疫期间中国政府确实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但是如果未来疫情不再是常态时，政府在有些领域可能要边际退出，还是要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更大的空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边界，我相信预期会真正提升。

黄卓：您又怎么预期2022年的外需，以及它对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伍戈：2020年底至2021年初的预测显示，2021年出口会下降，但是最新的出口数据显示同比增速仍然在20%以上。这确实展现了出口的韧性。医学家都无法准确预测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而基于不确定的判断做宏观预测，难上加难。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医学家有能力阻止病毒蔓延，相信疫苗管用。

全球的供需缺口现在依然非常大。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当前全球的需求要靠中国来供应，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以及工业生产都远远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因此，未来中国出口份额下滑的速度，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从这个意义而言，外需依然具有韧性。但是从周期来看，前瞻性的全球PMI指数，以及美国消费结构显示，商品消费几乎没有增长空间，服务业还在修复期，并不利于中国出口持续增长。

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认为未来中国的出口增速会降低，如果叠加2021年极高的基数，2022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下行的速度可能会非常明显。

房产税将如何影响人口流动？房地产行业风险与预期如何？

黄卓：房价和经济都会影响人口流动，具体而言，房产税会对人口流动有何影响？

赵波：从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一个地区人口净流入与否，主要还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对于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大。至于房产税对于人口流动的可能影响，取决于房产税收入的使用情况。如果房产税收入全



部留在当地，则可能会加剧人口的集中程度。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居民收入较快的增长会带来房价的快速上涨，而高房价又会带来更多的房产税收入，使得当地政府能提供更好的公共品，比如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增加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从国家改革的方向来看，在常住地享受更多的公共品服务是大趋势，人口流动的成本在未来会进一步下降，人口集中的趋势是会进一步加剧。

要避免特大城市过度拥挤、减少其公共资源提供负担，主要出路在于平衡区域的发展，减少而非加强要素流动的壁垒，让公共品的供给变得更为平均。根据我在前面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如果中央能够统筹使用房产税税收收入，增加对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将有助于让公共品的提供变的更为平均，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压力。

黄卓：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总体风险怎么样？未来会怎样发展？

赵波：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地产行业的总体风险和发展预期。

从2020年监管部门出台新规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债务增长的“三条红线”、房地产信贷集中管理开始，房地产企业的银行贷款发放就受到负面影响。对比居民部门的数据来看，居民现在的放贷余额是38万亿元，占GDP比重38%左右，这个比率相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居民负债并不是非常高，而且中国个人没法破产，这跟发达国家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个人总体并不太担心这部分的风险。至于房地产企业70%-80%的负债率，是过去多年累积的结果，也不完全是房企单方面的原因，还和银行、地方政府有关。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避免我们在执行政策时候一刀切、一管就死，要逐步化解房地产企业高负债率的风险。

目前控制房企资产负债率、现金负债比的规制政策是正确且十分必要的。短期来看，的确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但只有通过循序渐

进的改革，房地产风险会慢慢降下来，这对于维持长期房地产市场均衡的良性发展是有必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稳定预期，对于房地产市场尤其重要。如果居民部门或企业部门相信政府对于长期调控房价的决心，维持关于未来房价平稳增长的预期，那么预期的自我实现也会避免当前的房价的大起大落。

从最近这几个月的现实情况来看，贷款发放有所放松。正如我前面所说，应该区别对待居民贷款和地产企业贷款。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这将有助于在降低房地产风险的同时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过渡。

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读

黄卓：请卢锋老师分享如何看待跨周期调控新方针，以及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卢锋：2021年年中调整年初应对危机超常扩张政策是必要的，具体过程中退出节奏较快和力度较大，后续疫情局部散发派生间歇性冲击，内需特别是消费复苏受到较多制约，经济和就业恢复至今未能达到较为充分水平。现在高层决定要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预期2022年财政与货币政策会朝积极和扩张方向显著转变。

2020年7月底提出的跨周期调控是一个新政策方针。我国制定经济政策重视从现实出发和问题导向，这个新政策方针与特定现实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本意是要对疫情期宏观经济较大起伏进行跨周期管控，以求经济增长更为平稳有序。当然，在疫情复杂形势下，新方针实施也提出了一些需研究探讨的新情况。

随疫情变化，2020年初经济深度下跌后较快复苏，2季度已展现全面复苏形势。按逆周期调节思路，考虑2020年经济增速仍会是深谷，下半年政策似应继续相对宽松以助推较快恢复到疫情前趋势轨迹。不过这样2021年经济反弹强

劲达周期高点，下一年可能较大幅回调。这时跨周期调控实施较克制收敛的宏观政策，有助调控后续经济波动，由此可见新政策不拘泥成理论的创新特点。

结合实际总结经验，跨周期调控或需关注两点。与逆周期调节主要针对宏观经济运行已成格局加以调节管控显著不同，跨周期调控建立在对某个未来时段的下个周期阶段预期基础上，以预期出现的经济形势特点为前提，因而对有关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准确性要求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如果预测偏差较大，即便本来合理的调控意图就难以实现，甚至不能排除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方针，由此形成的政策协调机制在促进增长上作用重要。如果跨周期调控被理解为一段时期可淡化增长优先目标，一些部门利用“难得窗口期”频繁重手出台管制举措，可能派生不利的合成作用，并使跨周期调控所假设的未来特定增长形势发生内生性偏移。因而科学高效地跨周期调控，需缩小预期偏差并优化结构性管制政策。

目前经济运行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然而也有一个重要有利变化，就是跨周期与逆周期调控思路趋于一致，共同指向积极呵护经济复苏与趋势回归。随政策思路厘清校准，2022年新年后财政、货币及其它稳增长政策有望陆续出台，经济运行有望出现新的阶段性特点。

黄卓：最后请三位用一句话来表达对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期待。

赵波：短期的缓行是为了长期更大的进步，希望2022年政策目标更长远一点，坚持改革、坚持创新，优化供给，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伍戈：2022年是虎年，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虎虎生威”。要实现这样一个宿愿，我认为一要经济纠偏，二要重塑信心。“治大国如烹小鲜”，还是要更注重供需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卢锋：目前经济再次面临下行压力，当务之急是要正视当前困难，反思和总结经验，积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方针政策，使得宏观经济大盘在2022年能尽快企稳向好，使得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能行稳致远。



中美两个大国要为全球担当而协作，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争端上³⁰

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³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我看来，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以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与发展前景，虽然我们双方都各自面临着许多挑战，但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共同挑战。

中美的共同挑战

终结疫情、复苏经济是中美以及世界所有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疏通全球供应链的不畅，因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长久未有的严重通货膨胀。此时，我们应当团结一心，联手行动，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疫苗接种率，否则变异病毒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想要结束疫情就会难上加难。我们还必须对数字经济、大型科技平台、数据的使用与处理、数据的跨境移动、数字金融等方面加以规范，确保竞争环境的公平性，避免排他性和垄断。

这些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但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目前还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因为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挑战是各国所共有的，所以我们必须展开对话与合作，共同寻求应对之道。我们要控制各种风险对公众、隐私和制度稳定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应尽最

大可能从这一系列技术中获益。

我们也同样需要应对不平等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状态，而疫情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存在这个问题，且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全球形势都不容乐观。即使有些国土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中美两国，由于本身坐拥很多大型项目而有能力对冲掉一部分对于家庭及企业的冲击，但我们还是需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外国人，很显然我很难对中国的情况做出更细节的评价，但我知道“共同富裕”这个词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我认为它并不只代表一个挑战，而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对于中国提出这个目标，我丝毫不感到奇怪。然而，各种科技和市场的巨大力量在阻止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挑战。如果解决不了，就很难实现包容性的增长。

过去，我们两国都从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往来、科技交流、人员互动中受益良多。现在，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交往规则，因为从很多维度上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已经和以前不同了。此我们都很清楚，但我们要习惯并适应这种现状，

30. 本文根据斯宾塞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视频演讲翻译整理。

31.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管理学荣誉讲席教授、名誉院长，美国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宾塞1975-1990年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教授；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0年起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1991-1997年任美国国家科技及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2001年，因其在信息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否则将无法充分发挥各自的发展潜力。

我们的另一个利益共同点，是要找到方法来限制数字技术的进攻性滥用。当今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建设在不断发展的数字化基础上。对于生产率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模式而言，数字化的好处和机会是巨大的，同时也会促进医疗和教育等关键服务的可及性。然而，同诸多强大的科技一样，其负面作用也一定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规则来限制数字技术的负面使用，无论是在战争相关领域还是在网络安全领域都需要达成协议，以防止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造成威胁。

中美应排除误解，携手合作

林毅夫教授特别希望我可以对中美关系进行评价。对此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们两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和问题，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走在正轨上。我认为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我相信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希望能够共同扭转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在美国，两极分化问题让国家治理困难重重，但是两党当前对于中国的看法却是相似的，也就是都持负面态度。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点明显转向了国家安全问题，忽略了包括经贸往来在内的其他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以科技为核心的战略性竞争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据我所知，中国大概普遍存在两种对美国的看法：一是美国试图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大踏步向前的发展进程，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先进的、高收入的、多机遇的、技术先进的强国；二是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走向失败。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彼此国家的看法可能都不准确，也对两国关系起不到积极作用。美国方面忽视了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理念；而中国方面应该认识到，所有国家都会经历艰难奋斗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社会都会经历起起落落，不

能仅仅因为出现了问题和困难就草率地认为一种体制终将失败。

由于我们双方的关系呈现消极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贸易往来受限、资本流动不畅、金融体系不可避免的分隔、技术交流也正趋于封锁的边缘。“战略竞争”已经取代了“战略合作”的位置。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找到平衡，而这需要领导力。这样的领导力不仅仅来自我们两国领导人，也来源于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要付诸努力，尽我们所能，来改善现状。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这大概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复杂且最具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尽管利用现有的技术、机制和激励手段，我们能做的有很多，但是，所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来帮助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凭借现有的工具是无法实现最终目标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并非毫无依据。

我相信，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而言，如果技术无法自由地、毫无障碍地传播到全球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个问题就根本无法彻底得到解决。如果在今天与各位的交流中只表达一个愿望的话，我期待，无论我们之间存在哪些差异，无论我们面临哪些复杂挑战，最起码，中美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团结行动，共同解决气候问题。

我想再讲一下“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我的确很喜欢这个理念，因为它表达了非常美好的愿望，即我们想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蓬勃发展、从中受益，并获得机会的社会。我希望这个理念可以不仅局限于中国社会，而是用于整个世界，它要求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去寻找共同富裕的机会和方法，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也会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个词。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面对全球经济挑战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以共同富裕为目的来权衡利弊。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四大关键转型。由于我年纪较长，所以见证了不止一个改变。

第一、众所周知的大幅度数字转型，它的良性影响巨大，但在释放其全部潜力的过程中自然也会经历起伏；

第二、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能源转型，这与气候变化的挑战息息相关，也会对增长模式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

第三、我们的生物医学和医疗水平在不断发展变革，这非常振奋人心，但也和其他所有技术一样含有潜在风险，比如，我们能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应对多种疾病，产出多种全新的农产品从

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等，但这项技术也很可能被用在违反道德或法律的领域；

第四、随着亚洲经济的增长，全球经济重心也在向亚洲转移，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要适应所有这些挑战和转型。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挑起争端，或被其他不必要的事分心，因为应对这些巨大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已经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不容我们再浪费时间被其它问题分心，也不应再继续让我们两国间的关系、以及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对平衡继续走向恶化。我希望合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对话 | 如何理解数据监管、共同富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³²

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姚洋³³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姚洋：感谢斯宾塞教授出席我们的国家发展论坛。您提到全球目前面临着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例如在新冠疫情、数字经济、不平等、技术跨境流动、气候变化等方面，当然还有中美关系。您对中美关系提出的坦诚且极具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让我深受启发。您强调，中美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浪费在分歧上，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两国需要重新构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新型关系。

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几个问题。您说世界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在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数据的跨境流动方面。这也是中美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一国产生的数据应该只能在这个国家内部流动和使用，而美国则认为应允许数据进行自由的跨境流动。但最近我们看到，在如 TikTok 这样的案例中，似乎美国正在改变其立场，也开始认为数据应该保留在生产数据的国家。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谢谢姚教授。非常愉快能和大家一起参会并进行讨论。您提的这个问题对

于公民和国家而言都很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最高层对于数据的监管规则越来越严格。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仅在中国和美国，其实欧洲国家对于数据的管理和使用也有严格的监管。事实上，欧洲发达国家的数据监管政策比美国的更为严格。

数据安全非常重要。较为现实的方法是建立一个规则，要求某些种类的数据只能在本国内部留存和流动，我指的是个人/公民数据、企业数据等。原因在于国家对于此类数据的监管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如果让这些数据流入其他主权国家，监管的难度就会提高许多。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监管理念，我认为没有其他更合理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坐下来讨论，究竟哪些数据属于应该被严格监管的敏感数据。

如果对所有数据都严格限制跨境流动的话，可能对一些领域的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全球供应链、全球金融市场等。如果没有跨国的数据，这些领域的效率会大大下降。

因此，尽管我还没有一个完备的路径图，但

32. 本文根据两位教授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闭幕对话”环节的对话翻译整理。

33.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2016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我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对于不同类别的数据实施不同的监管政策：有些数据必须留在国内，被严格监管；而全球经济金融网络有效运行所需的那些数据，就可以允许其跨境流动，当然不是毫不监管，而是不要完全限制其流动。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姚洋：非常感谢您的真知灼见。您还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这大概是人类目前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中美两国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且重要的参与者。您在演讲中提到，目前我们两国间的技术流遇到了阻碍，必须早日转向紧密合作，开发使用新的技术去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需要更新它们的工业技术才能确保世界的全面绿色与低碳。但这种技术转换会使非洲国家的产业和工业化产生极其巨大的成本。中美该如何合作来共同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环保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迈克尔·斯宾塞：这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首先，我认为两国，尤其是中国认识到：把应对气候变化所需之有用技术的跨境流动最大化是一个合理正当的多边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多边机制，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创建出新的多边机制，从而确保相关技术可以最大程度地、最有效地跨境流动。

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技术方面，应该让一国的先进技术惠及世界，比如中国的太阳能技术；经济方面，以太阳能技术为例，过去太阳能技术的成本很高，但是现在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在日照充足的地区，太阳能是可以和化石燃料相竞争的。但这是一种资本密集型技术，需要考虑资本成本。在不发达国家或金融体系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就需要中国和美国这样的成熟国家去帮助这些国家降低投资成本，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障使绿色技术的使用在这些国家更加经济可行。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做法，首先是要承认中国、美国、欧洲都拥有非常重要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其次，我们需要展开合作，需要一起来规划，如何在多边框架之下推进这件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常提到多边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会获胜，但是我觉得两国还是有共同合作的空间来攻克难关的。

我还想讲一点，中美两国都是超级大国，在减碳方面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美国经济在未来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发展，现在美国的碳排放经过了庄严的承诺之后，也在逐渐减少。我想，美国和中国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如果两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放弃减排承诺，或者有任何一个国家不重视减排，那么就会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丧失努力的动力，他们就很难做好自己的减排工作。因为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世界是无法实现全面减排的。中国、美国及加拿大、印度、日本、欧洲、俄罗斯，这六个地区的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量的70-75%，甚至更多。如果其中有国家退出的话，世界就很有可能倒退回起点。因此，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做出榜样。

姚洋：谢谢，我追问一下，我记得当林毅夫教授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增加在非洲的基建投资。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否还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当然，我也支持这个计划。但可能现在我们要对计划中的一些事项稍做修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现在部分取决于其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是指物理概念上的基础设施，比如线缆、基站等，还包括廉价的智能手机、廉价且达到4G水平的网络等。拥有这些条件之后，这些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当移动互联网在这些国家的渗透率达到70-8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国家应对疫情不利的的原因之一也是缺乏关键的基础设施，而且这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也非常低。因此，这些国家需要加速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而在这方面，需要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携手合作，以帮助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姚洋：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中国最近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目前在中国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您也提到了共同富裕可能和经济效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我知道，关于政府应当更积极还是更保守，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正如您所说，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您认为这样的平衡是什么样的？

迈克尔·斯宾塞：积极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提出这个目标并不令人吃惊。在美国，我们称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这的确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活力和效率。简单地说，实现共同富裕有好的方法，也有不好的方法，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谈起共同富裕，美国人的普遍想法是，一定程度上是在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不会关注创新，也不会关注经济的活力与效率。极端地讲，这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进而摧毁私有经济。因此，

我们需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平衡。

但是我认为解决办法是有的，“有效政府”是可以存在的。需要说明的是，有效政府和大政府、小政府的概念不同，有效政府应以公共利益、公民福祉为目标，并且，有效政府很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可以代代持续的方式来实现目标。我们都不希望政府的政策只对未来几年的发展有利，却以损害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和机会为代价。中国政府也明白这一点。

其实公众并不要求完完全全的平等，大家都明白不同的人群在市场经济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不同，并且人各有偏好。举个例子，我相信姚教授一定清楚，您如果在金融机构工作，收入肯定比现在做学术要高得多。我也如此。但我们喜欢做学术，这是我们的选择，无可厚非。

在我看来，未来的道路应当是让有效政府确保把社会资源有效地分配给公民，使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做准备；并且，有效政府应当扮演为私有经济做补充的角色，以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从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角度，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简而言之，我认为，一个运行非常有效的政府，是有能力极大程度地减少“共同富裕目标”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效率”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快速发展仍是中国未来 30 年关键中的关键³⁴

林毅夫³⁵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非常高兴能在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闭幕式上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今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踏上了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背景中来思考。在新征程上，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外，我们还要在新征程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认为，所有这些目标能否实现都与我国能不能保持一个较为良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今天演讲的主要观点是——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兴盛的文明。16 世纪之前，中国的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将近一千年，人均 GDP 高于西方国家，并且人口众多，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拥有最兴盛的文明。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发展加速，但中国还停留在过去的发展方式，人均 GDP 很快从世界领先跌至西方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落后国家。

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均 GDP 必须赶上，发展是基础，没有发展，任何目标都难以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启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增长奇迹，目前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在 2021 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但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相比，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左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人均 GDP 至少要达到美国的 50%。要从“四分之一”变成“50%”，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速度要比美国快。

我们的人均 GDP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何时能够达到美国的 50%？我做了计算，如果我们的人均 GDP 增速每年比美国高 2.5 个百分点，那么到 2050 年大概就可以达到美国的 50%；如果高 1.5 个百分点，那么要等到 2070 年；如果只高 1 个百分点，那么还要等到 2090 年。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不得不加快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两个内涵：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非常重要，但是如何才能

34.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闭幕演讲整理。

35.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

提高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根本的决定因素有两个，即经济体量和服务业占比的提高。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很大，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比重就会越高；同时，服务业中许多是不可贸易，服务业占比越高也会使得国内循环比重加大。要扩大经济体量与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必须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归根结底是要发展经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由经济格局改变引起的。20世纪开始的1900年，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是由当时世界的八个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组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他们当时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为50.4%。进入21世纪的2000年，又一个“八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前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崩溃，被加拿大取代。此时，八国集团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为47%。整个20世纪，八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基本没有变化，以经济为基础他们一直左右着世界格局，世界是战乱或是和平决定于这八个国家的关系。例如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和其他六国组成的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引起，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和其他五国组成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引发。

2018年，总书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时，八国集团（G8）GDP总量的全球占比已经下降为34.7%，只略高于三分之一，失去了主导世界格局的能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过去应对这样的危机，只需要八国领导人开会做决定就能化解，但这次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召开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来应对，此后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决定着世界的格局。

为什么八个工业化强权的GDP在全球的占比在整个20世纪都能保持稳定，而进入21世纪后就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原因是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我们的GDP总量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6.9%上升至2018年的

16.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换句话说，八国集团GDP占比下降的12.3个百分点中有80%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致。

中国快速崛起对谁的影响大？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2000年，美国的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占比为21.9%，但2014年被中国反超。经济基础决定世界影响力，中国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世界影响力也在增强。于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出现了。这个矛盾给世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时候世界格局才能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期？我认为，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左右时。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我国的发达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和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人口加起来4亿多一点，人均GDP可以和美国人均GDP相当，人均GDP代表着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平均产业和技术水平，美国就会失去了卡我国脖子的技术优势。同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并且，今天上午我与斯蒂格利茨教授对话时讲到，贸易是双赢，小经济体的获益会比大经济体大。到那时，美国在和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要比中国多得多，美国的财富500强的企业要维持在财富500强的地位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美国要就业要增长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届时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自然也就心悦诚服。

正如前面的计算，如果中国人均GDP增速每年比美国高增速只高1个百分点，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50%要等70年，世界不稳定的格局就太漫长，所以中国应该发展快一点。

发展快的同时，还要保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发展，其中创新是基础，因为只



有创新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才有物资基础实现其他 4 个目标。中国在创新上有很大潜力。目前我国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代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我国在 2019 年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 22.6%，与德国在 1946 年、日本在 1956 年、韩国在 1985 年时和美国的差距处于同一水平，此后 16 年这三个国家利用与美国的差距所具有的后来者优势，保持了年均 9.4%、9.6%、9.0% 的增长，扣除人口增长，由劳动生产率的生长所带来的增长则分别达到 8.6%、8.6% 和 8.1% 的年均增长，即使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不增长，在 2035 年之前单纯依靠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保持 8% 的增长潜力。更何况，中国目前和当时的德国、日本、韩国比，还在技术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领域具有换道超车优势。鉴于此，我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了让世界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到新的稳定格局，发展尤其是保持一个较快速度的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在本阶段拥有的发展潜力。

当然，中国在未来发展中会面临不少问题，但绝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慢速度。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发展问题，发展快的时候有问题，但发展慢的时候问题通常会更多、更难解决，因为只有发展快的时候才可能创造更多资源、更具信心地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在此举办国家发展论坛，讨论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我借此机会强调，正如中央的文件中一再强调的，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有发展越快，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才会越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赖于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世界才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2022 年企业经营关键词³⁶

陈春花³⁷

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我自己每年到 12 月就会去思考下一年，这对我非常有挑战，我也会很忐忑，因为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如何去理解变化，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在每年的国家发展论坛上都会把自己对下一年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让大家了解下一年企业经营的关键词。

2021 年，一个疫情依旧挥之不去、散点发作笼罩的年份，一切都显得与以往大不相同。

2500 年前，赫拉克利特说“一切事物都处在流变之中”，这句话用来注释 2021 年再恰当不过。“流变”正是今天最显著的特征。我们沉浸在一个数据、信息涌动的社会环境之中，所有事物因此而发生着性质、表征上的变异。很多习以为常的事物，现在都变得异常，各种认知和观点于广泛传播之中，衍变与冲撞。

有些变化给我们的发展带来益处，但也同时带来困惑，比如：

- 人类转向“元宇宙”亦或星辰大海；
- 人口流动、老龄化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 数字革命快速淘汰落后个体甚至落后群体，让人的生存备感压力；

- 妖魔化、污名化、蒙蔽事实带来的信息混淆；
- 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平衡；
- 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商品与公共产品的边界融合；
- 数据治理、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带来新的问题
- 随着规模与技术能量不断放大，企业该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

这些冲击、挑战、问题、压力等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混沌，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复杂世界之中。

技术更是带来挑战的关键因素，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一部分甚至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人工智能的出现，更让人有些胆怯，不知道未来人会处在何种境况？如何才能在未来的世界中找到人的价值与意义？

在这样一个流变的时空里，我依然坚持强调，突破认知局限，去驾驭未知与变化；通过深度学习快速迭代自我，寻找到与变化共处的解决之道；进化出克服不确定性的能力，并从不确定性中获益；拥有一种韧性成长的力量，实现穿越周期的增长。

对于将要到来的 2022 年，我依然不是用预测的方式，而是用认知的方式来谈谈我的想法。

36. 本文根据陈春花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世界大变局下的企业战略”平行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37. 陈春花：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三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多次获得研究论文奖和出版界年度最佳作者奖；两次获得《清华管理评论》“年度管理创新思想家”。两次获评《财富》“中国 50 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蝉联四届《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 25 位商界女性”。



理解 2022 年的经营环境

1. 新冠疫情成为新常态

随着新的抗病毒药物、改进的抗体治疗和更多的疫苗陆续问世，人们会迎来新疫情防控下的生活环境。根据专家们的判断，对于接种疫苗的人们来说，这种病毒将不再威胁生命，但是对于还未接种疫苗的人们来说，仍将构成致命威胁。全球不同地区接种疫苗的程度不同，这也意味着新冠疫情成为新常态，我们需要在一种新常态下生活与工作。

疫情散发式出现、未知的病毒变异、有限流动、混合式办公、远程交流、人机交互、监管防控、自由与约束等等一系列的改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计划以及商务活动。

这一切，也决定了人们需要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范式、新的发展模式，以及新的增长方式，如果企业依然还是沿用原来的发展模式，一定会陷入困顿。

2. 新格局演变与生成

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气候危机带来的紧迫感，全球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经济全球化受阻，多边主义受到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不确定性加剧等成为干扰经济发展与世界格局的因素。

中美之间的竞争，在贸易、技术监管、关键技术、疫苗接种、空间站、教育与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展开，这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与特征，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加速重构，更加剧了技术转移与产业重组的速度，带来全球产业格局与发展格局的变化。

“双循环”下的市场布局与经济发展新变化，如何确立战略着力点，获得发展空间与先机，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全球的视角去看，我们需要从已经习惯的

强国之间构建的世界格局中转化出来，去认知强国之间、再加上科技巨头公司，三方构建的新世界格局。

从行业的视角去看，超越行业已经成为基本态，数字技术带来的“联动效用”，重构了产业上下游的关系，不同领域与不同行业的跨界融合，以及数据与客户连通的全新价值空间，这些也导致产业格局处在重构与重塑之中。

3. 使命运动成为主流

数字技术成为生活方式之后，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数字巨头企业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量，无论是客户、投资者、员工还是政府部门，都开始关注企业是否具有使命，是否心怀社会，而不是仅仅追求商业利益。

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估系统，也从原来关注业务发展能力、持续为客户创新产品的能力以及为股东提供最好回报率的标准，增加了有关三个方面的责任：对世界的贡献，帮助改善每一个人，以及长期发展。

现在，每个企业也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存在并以自身存在为目的，每个企业都是社会器官，必须为社会而存在。使命的经济收益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使命可以帮助构建有生命力的品牌，激活并吸引顶尖人才，确立持续的发展能力。

4. 在未知世界中探索

2021 年，也许是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标志性年份，有人把 2021 年定义为“元宇宙”的元年，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字节跳动的张一鸣、腾讯的马化腾都展示出对元宇宙投资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 2022 年将是“作为付费乘客前往太空的人数将超过由竞争对手太空旅游公司搭载的政府雇员。”的第一年。以马斯克、贝佐斯、布兰森，加上谷歌的佩奇和布林，探索航空器成为新的选项。

人类开启数字替身之旅，也开始了火星太空

之旅。虚拟三维空间、真实太空空间，人们开启了脱胎于现实世界的未知世界探索。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生命科学带来的全新想象，也从不同的维度颠覆着各个行业与各个领域，如数字货币、云原生平台、自治系统、加密成长、超级智能化、分布式企业等等，希冀用技术创新带来可拓展性和可成长性。

上面这四点，就是我对 2022 年经营环境的认知。

2022 年经营选择的关键词

基于如上经营环境的认知理解，2022 年经营的选择依然非常困难，也极具挑战。

我的选择如下：

1、以顾客为中心

持续聚焦顾客价值创造，应该说是我坚持不变的原则，所以，2022 年的经营策略选择，我依然以聚焦价值创造为首选。

疫情新常态下，会有更多的顾客需求场景出现；新格局的挑战与未知世界的探索，同样会展现全新的价值空间。

当企业能够真正以顾客为中心，回归顾客价值创造之中，就能感受到，一个又一个新业务场景的涌现；新技术与客户进行互动时，更深层次、更有针对性的价值空间便被呈现出来；各个领域前瞻性的顾客价值方案，也随着技术开发程度不断演进，顾客价值创新推进，被一一创造出来。

在我看来，那些能够把技术与员工、供应商、生态伙伴协同在一起，连接共生，为顾客提供飞跃性价值的企业，正在获得并将继续获得跨越周期的价值增长。

2、塑造变化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企业需要在稳定性、灵活性和复杂性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企业必须

自我塑造变化。一方面企业需要引领变化，构建企业或者行业的新价值；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持续价值创造，让企业自身具备动态变化的能力。

我把这两方面的努力，合称为“创智行动”。“创智行动”是指围绕顾客价值创造性展开的一系列活动，需要企业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组织管理，组织成员具备更强的组织学习能力，以及自主行动创造的能力。同时，企业提供数字化技术赋能、激励价值创造以及包容多元的组织氛围。

对于今天的企业而言，透过创智行动，拥抱变化，自我加速变化，必须成为一种习惯。唯有此，方可拥有主导市场的力量，以及获得顾客青睐的魅力。转型变革永远在路上，保持谦逊，把每一步都作为起点，变化才是永恒。

3、慢变量是关键

找到自身的使命 我们需要一种真正关注长期发展的模式，而不是短期的收益。

认知企业与外部世界关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技术已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在深刻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导者的决策比两年之前更复杂，企业处在更广泛、更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体系中；人工智能变革不断提升价值，同时也导致人们遭遇完全不同的压力和冲击；努力践行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责任，关注企业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需要让自身的使命传递到产品与服务中，让组织成员从使命出发，确定每项任务如何让世界更加美好，如何更好地帮助顾客，如何推动社区健康发展。当以人为中心，利他共生，科技向善内嵌在企业使命之中时，商业所释放的价值，一定会在社会价值创造中熠熠生辉。

4、韧性成长

在疫情危机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微软提出韧性成长（ResilientGrowth）方法论——帮助全行业用大数据迭代运营管理，打造技术韧性；用



数据洞察助力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业务韧性；注重培养，以人为本，用创造力文化实现内生的韧性成长。我认同并把此作为 2022 年的经营选择。

企业需要有组织的敏捷性，以及足够的组织韧性，方可在动荡变化的环境中找到解决方案，获得成长。疫情防控、环境的不确定性推动了对组织弹性的需求，也因此需要企业内部更多的敏捷性。同样重要的是，越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组织韧性越呈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事实证明，韧性不仅是一种抵御危机的能力，更具有与动态变化相调适与不断进化的特征。回顾 2020 年那些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实现逆势增长的企业，它们的共性是具有快速反弹的敏捷性，强烈的创新基因，以及同心协力应对危机的组织韧性。

接着下来的企业发展中，无论是数字化转型，还是技术创新价值，抑或是未知世界的探索，把创新融合在企业文化中，形成内部的敏捷协同效率，以创造力实现内生的韧性成长，既是方法论，也是战略选择。

结束语：重要的是永续学习

2022 年，注定会在一个流变的时空里，脑海中依然是赫拉克利特的声音响起：“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这也引发我想到，Gartner 副总裁、分析师兼研究员 Daryl Plummer 在 Gartner Symposium/Xpo™ 2021 的演讲中表示，“更重要的是永续学习，从多角度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而学习也是一个共同的责任。”

周遭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世

界正处于创新云涌时期，多角度的学习让我们得以发现令人惊喜的新世界，虽然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但孕育着更大的可能性。

学习作为一种责任，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那些我们尚未理解的知识，并能够接纳与灵活运用这些来解决问题。

欢迎大家来到北大国发院，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永续的学习可以带领我们，用知识的光辉驱散无知，用学习的力量探索未知，并以此获得持续成长的基础和动力。

也因为学习，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个未知的这个世界里面，依然蕴含着人类内在的精神力量，认知自我，不断探索，跟随智慧，从心向善。

最后，在流变的时空里我送给大家四句话：

第一，你必须突破自己认知的局限来驾驭未知和变化。

第二，你必须学会通过深度学习，快速迭代自我，寻求与变化共处的解决之道。

第三，你必须进化出克服不确定性的能力，并从不确定性中获得收益。

第四，你必须拥有一种韧性成长的力量，实现穿越周期的增长。

我们一起努力去做四句话的时候，一定会迎来巨大成长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对 2022 年的选择。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并预祝大家在 2022 年取得新的成长。

科技创新企业的榕树模式³⁸

薄连明³⁹

深圳光峰科技合伙人、CEO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的大前提是时代之大变局，而这个变局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科技创新。我来自深圳一家科技创新企业光峰科技，几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接待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中央党校的老专家，他们是为调研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而来。我们公司名不见经传，怎么会来我们公司调研？他们说，深圳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企业，如果看深圳40年的发展就要看蛇口，如果看深圳30年的发展就要看华为，如果看深圳20年的发展就要看腾讯，如果看深圳近10年的发展，大疆、光峰等是重要的新样板企业。

老专家们此番调研和评价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那么，我们这些专家眼里的新样板，意义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深圳科技创新企业有两大独特之处：

第一，坚持原始创新、科技驱动。国内其它很多地方的创新可能主要是先引进国外从0到1的创新，然后自己再做从1到N。而深圳很多企业敢于从0到1，敢于无中生有，敢于做颠覆式创新，并且大部分是靠技术驱动。

第二，深圳知名中小企业，成立时间不短了，

大致是十年甚至十年以上，都经历了默默无闻、从小到大、厚积薄发的过程。

从小到大才是美

我此前大企业，来这家时还是小企业。其实大企业有“大”的问题，但小也不见得一定就美，小也有“小”的问题。不过，从小到大的过程是美的，我称之为“成长之美”。

企业要找到自己的成长模式，我把常见的成长模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蜕变式，毛毛虫蜕变为蝴蝶，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形或质的变化，如IBM。

第二，独木式，产品形态单一，简单复制，如同海底捞。

第三，苔藓式，小单体规模，借助资本的力量，遍地开花，如瑞幸咖啡、共享单车等。

第四，森林式，大树与小草等多物种共生，如小米。

这几种模式的区别不在好坏，只是需要的竞

38. 本文根据薄连明在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世界大变局下的企业战略”平行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39. 薄连明：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CEO，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管理实践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商总会会董，中国管理模式50人成员。曾任深圳航空公司总会计师，TCL集团执行董事、总裁，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CEO、董事长，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CEO、董事长。



争力和资源禀赋不同。

“榕树式”发展模式的成长逻辑

但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我比较推崇另一种独特模式——我称之为榕树式。榕树的重要特征是独木成林，根系特别深、特别密，且树干特别壮，枝繁叶茂。因此，像广州市也把榕树作为城市的象征，代表长寿、包容、常绿、顽强、长期。

光峰科技就属于榕树式发展模式。我们做激光显示、激光光源等，我们的应用场景很多，但商业模式并不复杂，“根”就一个根，是我们独有的激光荧光显示技术，“主干”就一个主干，也就是核心器件。

榕树式发展模式基于以下三个重要逻辑：

一是根部战略。找准根部战略效应，因为起点决定初心和成败。但起点从哪里找是个大问题，从竞争出发，则是加入满足现有需求的竞争者行列；从价值出发，则是去满足人类未满足的需求。从根本上讲，科技创新企业更应该从价值出发。找到价值原点很难，但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创始人做出的主要贡献。找到原点之后就要把根深扎下去。

二是强化主干。主干是根部战略的转化，需要足够强壮、不断壮大。因此需要定期剪枝去叶强化主干，帮助主干吸收根部营养，同时为枝叶提供成长支撑。这是发展第一阶段必须做的。

三是枝繁叶茂。基于主干，不断延展应用场景并拓展客户，形成气根；同时深扎土壤，气根壮大反哺主干现金流，促使枝繁叶茂。也就是各项业务要能够自行从气根部土壤吸收营养，有能力自生存，还能反哺主干。

与此同时，科创企业发展过程中，还要坚持“三大主义”：

一是价值主义。企业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创造顾客价值，我们应满足市场尚未满足的需求。

二是技术主义。坚持科技属性与创新驱动，专注于从 0 到 1 的颠覆式创新。科技创新非常伟大，起点应该是从技术出发，推动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反过来。比如，我们在电影院中首推激光光源用于传统放映机的改造，创新地采取了分时租赁的服务模式，是全球第一家敢在电影院中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根源点来自于我们激光光源技术的恒定性和稳定性，来源于我们的技术自信。

三是长期主义。科技创新企业要选择足够长的赛道，跑马拉松、拼耐力，十年磨一剑。因为科创企业拼短跑是跑不过互联网企业的，不等你跑完，比赛就结束了。同时，赛道要足够宽，能够容纳多个竞争对手，形成多个商业模式，这样才有发展壮大可能性。公司有两类，一类属于“快公司”，另一类属于“慢公司”。2019 年科创板第一批 25 家企业上市，有学者统计，这 25 家企业平均成立时间都 11 年了，创始人平均年龄也达到了 52 岁。对我们而言，慢就是快。

科创企业成长的动态管理循环与升级

榕树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初步形成独木成林的景观，也需要 10 到 20 年时间，其成长相对缓慢。在此期间，需要不断培育，并用管理赋能。最主要的是把握机制、体制、文化和能力四个方面，坚持机制牵引、体制保证、文化导向、能力支撑这样不断进行的管理循环，使企业能自然地茁壮成长。

需要注意的是，科创时代的管理不断升级，上述四方面内涵与过去有所不同。

- 机制牵引方面，科创企业特别是数字化企业以合伙人制代替职业经理人制，以共享利益，形成长久内在的动力机制。过去，传统企业都特别注重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外部人控制，而如今的科创企业反而需要回归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内部人控制。

- 体制保证方面，要以今天的齿轮式水平网状组织代替过去的科层垂直集权制。
- 文化导向方面，要以愿景驱动，以当责文化代替被动执行文化。

- 能力支撑方面，要激活个体和组织，让个体与组织共生，不断进行管理循环，促使个体、组织共成长。

做到这些，就可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之美。



传统平台的数字化转型 决心和方法一样都不能少⁴⁰

汪林朋⁴¹

居然之家创始人、董事长、北大国发院 EMBA2003 级校友

说到传统平台在数字化过程中的挑战，就要先清楚什么是传统平台？主要特征是什么？传统平台是只为品牌商提供销售场地和渠道（“场”），不直接为消费者（“人”）提供商品和服务（“货”）的商业业态，比如百货店、购物中心、大卖场、超市、专业市场等，这些都是传统平台。

中国传统的大型零售商基本上是平台服务商，也就是“二地主”，他们只提供渠道和产品，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不直接卖商品，这是中国传统商业最大的特点。这种模式就决定了他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卖场只管“场”，不管“人”、不管“货”、不管“商业”。但这样的问题是：品牌怎么出得去呢？因此，人、货、场三者要结合起来。

传统平台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第一，从经营模式上来讲，只管“场”，不管“人”和“货”，数字化转型就缺了两条腿。

第二，从管理模式上来讲，中国传统平台基本停留在 IT（信息化）阶段，而离数字化（DT）阶段还有一段距离。在 DT 时代，传统平台要搞数字化，如果还是传统 IT 部门去搞就会很难。企

业的数字化不等于 IT，我们在行业里交流数字化时，能感受到 IT 部门跟数字化部门衔接有难度，企业会增加内耗等问题。

第三，从组织结构上来讲，传统平台都是“金字塔”式、“科层制”式结构，与数字化的扁平化、共享化要求差距甚远。比如居然之家一个大学生毕业刚进来，要晋升到总裁，中间有 16 级之多，即便升一级用一年，想当上总裁就得 16 年。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根本没法搞。居然之家原来是四级结构，集团总部、省公司、地市公司、县公司，企业做数字化难度非常大。为了真正的数字化，我们就必须组织上实现扁平化，因此下定决心把县级的结构拿掉，让地市公司直接管。但是这两年在 21 个公司推行下来，感觉非常难。这是传统企业转型中切身感受到的主要挑战。

居然之家的转型探索

对于数字化转型，居然之家这几年进行了几方面的探索：

第一，以顾客为中心，建立流量运营平台，解决“人”的数字化。原来居然之家有 40 多家门店，一年有 1000 多亿的销售额，第一件事就是如何

40. 本文根据汪林朋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世界大变局下的企业战略”平行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41. 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集团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兼 CEO，居然之家集团党委书记，北大国发院 2003 级 EMBA 校友。同时担任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业商会会长、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等职。曾多次获得中国家居行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奖，2019 年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并荣膺“中国品牌 70 年 70 人”殊荣。

把顾客吸引到门店来。现在互联网时代，商业最大的变化是分为线上/线下不同的渠道和阶段，不管买房子，还是买汽车，都离不开线上的口碑。商户进入我们的平台，所有顾客的信息都在居然之家的系统里，统一收银，当然所有的营销费用也由居然之家担负。流量池建立起来以后，就有了流量分发能力，居然之家与商户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是目前在行业里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赋能B端品牌商，向产业互联网S2B2C的产业模式转型，解决“场”和“货”的数字化。我判断中国以后的每个商业都是产业互联网模式。比如房地产经纪行业，链家在自己的服务能力做到非常深的时候，向同行开放，就是陈春花老师所说的协同，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要发展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开发当然需要人才，一般中小企业根本没有数字化平台投入的能力，只有行业里的头部企业把平台打造出来以后，再向产业链开放、成为产业化能力。现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比如大家都觉得家装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要找设计师，要买各种材料，还要找工人来施工……现在这个行业就在PK，居然之家跟阿里合作在搞“每平每屋”，贝壳也在做类似的。不妨想一想，对于家装施工长来说，一旦进入某个产业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获得多么大的流量。各行各业向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最终也就是S2B2C的产业模式，将现行服务能力和平台服务能力相结合。比如贝壳基于链家的积累，就可以保证其核心竞争力，别人想做但很难做到，因为它是跟着自己的商业模式转变的。

第三，运营的数字化，从IT转向DT。传统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如果还是依托于原来的IT管理部或IT管理中心，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向DT去转变，把企业的数字化中心置于IT之上，

或者单独出来运营管理。

第四，组织的数字化，要强调扁平化、共享化、创业化。企业内部要协同，外部要协同，企业就要越来越扁平化。对于企业CEO来说，有了数字化平台以后，组织管理就完全可以承受了。在共享化方面，居然之家正在把采购中心全部共享，每个地方省公司、分公司的采购都可以共享，人事、财务、法务也都可以共享。还有创业化，现在90后、00后这些青年人跟之前的几代有些区别，他们愿意自己创业当老板，我觉得能够在企业内部让员工为他自己工作，让员工将公司当作他自己的创业平台，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接触居然之家更多的只是家居大卖场，其实下面还有好几条新业务线，像每平每屋、洞窝、居然管家，都是和员工一起孵化出来的创业平台，他们为自己工作，建立起了很好的激励机制。

小结

中国的家居行业规模很大，有5万多亿元的产值，而现在这个行业的问题依然很多，服务和效率都有待改进，但这正是居然之家未来的机会所在。如果我们能带头解决这些问题，就提升了企业本身的价值。在这么大的市场里，目前没有过千亿的企业，每家企业都还很小。从世界范围来说，市值最大的零售企业是家得宝（Home Depot），市值已经超过4300亿美元，而沃尔玛的销售额是家得宝4倍，但市值不到4000亿美元。还没上市的宜家家居，2020年的销售额为491亿欧元。这说明家居市场的空间无比广阔，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跟上数字化的发展步伐，就有美好的前景。



一、2021年12月4日，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承办。本届年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18家年会理事单位代表、26位国内一流高校经济学院系负责人、140位入选论文作者、10家一流学术期刊代表、10家招聘单位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学生逾300人相聚西安，37万人次通过云端参与年会。中国经济学年会创办于2001年，年会秘书处设在北大国发院，年会现任理事长为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

二、2021年12月19日，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承泽园院区隆重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世界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联合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发表主旨演讲，并与国发院林毅夫、姚洋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北大国发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等北大学者团队，以及政、商、学界前沿人士共同研讨影响国家的重大挑战，以远见与智慧助力国家发展、推动世界融合。

三、2021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国务院参事、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会并发言。

四、2021年12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国发院共三位教授著作荣列此次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名单，分别是：1.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著《中国经济学创新成果文库》（15卷/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 林毅夫教授以及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学术副院长王勇等著《新结构经济学丛书》（5卷/册，北京大学出版社）。3. 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专著《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人民邮电出版社）。

五、为庆祝中国MBA教育三十周年华诞，12月24日，由央广网主办、中国MBA教育网承办的“2021央广网MBA教育峰会暨中国MBA教育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获评“2021年度MBA卓越商学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姚洋应邀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六、近日，北大国发院余淼杰教授的英文专著“China's Miracle in Foreign Trade”由Springer、格致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是余淼杰教授继“Trade Openness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US Trade War and Trade Talk”、“Exchange Rate, Credit Constraints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之后的第四本英文著作。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 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